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五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北宋吳越錢家婚宦論述

柳　立　言

本文的問題有二，一是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吳越錢氏在歸宋後的遭遇。趙翼《廿二史箚記》以「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來稱讚宋帝的仁德，但傳說中，南漢劉鋹、吳越錢俶、南唐李煜、甚至後周的柴氏孤兒，均死得不明不白。除了個人的存亡外，家族的盛衰無寧更爲重要。本文指出，錢氏在太宗一朝幾乎淪落破蕩，幸賴眞宗的登場和時代的改變，家族的命運始得扭轉，終於由衰而盛。

在這掙扎的過程中，產生了本文的另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史上的階層流動。錢俶和平納土，直系親屬加官晉爵，一開始就處於上層，他們的問題是如何避免下降。較疏遠的族人，入宋時只有低微的官職或平民的身份，屬於下層，他們的問題是如何爬昇。處於中層的族屬，則同時面臨著或升或降的問題。本文指出，科舉和恩蔭只能帶動和維持下一中層次的流動，而必須藉婚姻和其他策略來進行高層次的攀升，後者如文武雙軌發展、內廷當差、和進入清要之途，這樣所形成的人際網絡實有「新門閥政治」之嫌，亦即高層次的權力仍由少數人長期在幕前或幕後所瓜分，並非如中、下層的開放和流移。

前　言

宋代爲近世家族型態的肇始，近年來已有不少中、日、和西方學人進行研究。各家的論點雖有不同，但目的都在探討家族（主要是資料較多的士大夫家族）的崛興和維繫。一般而論，優秀的領導人物（尤其在仕宦上）、充裕的物質基礎（包括義莊）、穩定的教育計劃、成功的婚姻關係、良好的家訓家法（包括財產管理），加上族祭和修譜等敬宗收族的手段，都是對家族有利的條件。擁有的條件愈多便愈成功，可視爲一定的通則。然而，除了透過這些條件來視察一個家族外，還應注意，家族之興衰又因各自的特質而有特殊的情況。本文即想藉著

探討一個家族的成功歷史，說明世家大族每每有特殊的策略來維持不衰。就吳越錢俶家族來說，除了憑藉科舉、蔭補、和與名門貴族通婚外，還包括利用文武兼備的背景來進行內外廷雙線發展、以及爭取進入清要之途，俾能接近兩府和留在家族的新根據地開封等。假如我們能進一步證明其他的舊族或新興名族因採用同樣的策略而交錯聯結，則宋代所謂「士人政治」可能有大部分只算陶晉生先生所說的「新門閥政治」(1989)，而科舉制度對促進高層的社會流動的貢獻，恐怕也要重新評估。

本文以錢氏爲研究對象，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錢氏在宋代政治、社會、和學術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一直在後人心目中保持世家的形象，[1] 卻一直乏人研究。錢氏在國主錢俶納土後，整個宗族被遷到開封，他們如何以降臣的身分在一個新的環境裡立足和發展，渡過家族衰敗的危機和尋求新的生機，便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第二，對錢家之研究正可反映宋代不同類型的士大夫家族的興衰。錢家各支因宋室待遇的不同，可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是錢俶一支。他本人保持國王的封號，諸子都授節度使和團練使等高級武官，而嫡系更自眞宗時開始，享受「錄諸國後」的權利，恩典不絕。中等的是錢俶兄弟各支，依其成員的年紀和在吳越的官位而授官或職，但後代大多數不能再享受此優待。下等的包括錢昆和錢易兄弟，他們是錢俶異母兄遜王倧的幼子，只具有平民的身分，賴科舉而入仕。這三等正好是宋代官僚構成的縮影：俶與其子代表最高級的士大夫，他們恩蔭的特權至少可維持三代。兄弟各支是中間層的士大夫，他們的恩蔭有限，假如下代沒有高官，地位便容易下降。錢昆和易則可以反映靠科舉入仕的平民（也許應是條件較好的平民）。

本文以北宋爲限，以錢俶一系名列《宋史》、《宋元學案》、《東都事略》、和《皇宋十朝綱要》的知名人物爲對象，通過他們的經歷，研究錢家的發

1　例如清代蔣伯超就說：「龍眠三李，系出南唐；孟昶諸孫，進士及第。然十國之後，要以吳越爲最繁。〔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譜類一門有吳越世系歌、吳越錢氏分派略。其閥閱之華，可以想見。」（《南漘楛語》，卷3：「錢氏之盛」：16b-17a）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1：「譜牒類」：27a還列有吳越錢氏傳芳集、錢氏傳芳後集、錢氏世譜續編、彭城世徵、虛窗手鏡、資世文鑰、錢氏家乘續集等。

展。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確知錢氏各支的往來情況，下文就依上述的三等把他們分成三個單元來處理。當然，歸宋的錢氏子弟數以百計，不可能一一追究，其中，例如錢惟演，個人的事蹟便可寫成獨立的長文。故此，本文無意作傳記式的研究，重點只放在婚宦之中影響家族盛衰的事例，以別於一般的情況。

第一節　錢氏歸宋

公元九六〇年，宋太祖趙匡胤代周而興，實行先南後北的策略，先行汲取南方的財富，充實國力，然後北伐。[2] 到了九七五年，荆南（高繼沖）、湖南（周保權）、蜀（孟昶）、南漢（劉鋹）、和南唐（李煜）已次第平定，只剩下閩南的漳泉（陳洪進）和兩浙的吳越。漳泉只有兩州十四縣，微不足道；吳越則據有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五十五萬餘戶，經濟發達，是趙氏得之而後快的膏壤。但是要盡得其利，避免戰爭的破壞，最好自然是由吳越自動納土了。

吳越自錢鏐在八九三年受唐朝封爲鎮海節度使後，經三代四傳至錢俶（鏐—鏐子元瓘—元瓘子佐—佐弟倧—倧弟俶），已經立國八十多年。錢俶切實執行錢鏐所定下的「事大」政策，奉中原爲正朔，更進貢無數錢財，資助太祖進行統一。[3] 他還應太祖之命，助攻南唐。南唐主李煜曉以脣亡齒寒之義，俶不爲所動，並以事白太祖。[4] 錢俶如此忠順，不但搏取了太祖的好感，也贏得了在當時修撰的《舊五代史》裡「世襲」而不是「僭僞」的地位。[5]

對太祖來說，吞併吳越，不在能與不能，只是時機問題。[6] 錢俶的恭順，使

2　太祖曾對皇弟太宗說：「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河東……俟我富貴，則取之。」（王稱《東都事略》，卷23：「臣稱曰」：10a-b）

3　錢志遙等《吳越錢氏宗譜》，卷1：「武肅王八訓：二曰」：2a。參見註10有關稱帝事。

4　脫脫等《宋史》，卷480：「錢俶」：13897-13909。

5　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133：1776：「史臣曰：……唯錢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蓋事大勤王之節，與荆楚、湖湘不侔矣。」

6　例如在吳越加倍納貢時，太祖說：「此吾帑中物矣，何用獻爲。」（歐陽修《新五代

太祖決定暫緩其事。當錢俶在九七六年奉命入覲時，太宗（時爲晉王）和宰相等人都請太祖逼他納土，但太祖反而答應錢俶，「盡吾一生，盡汝一生〔太祖時年四十九，長俶兩歲〕，令汝享有兩浙地。」俶「以帝賜重約，既得歸，喜甚，以爲永保其國矣。」[7] 想不到太祖就在當年十月駕崩，而太宗無意履行「盡汝一生」這一半的承諾。

九七八年，錢俶入覲，同時到達的還有漳泉陳洪進納土的獻表。至是，吳越更形孤立，但錢俶猶存僥倖之心，於是試探地請罷吳越國王封號，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兵甲屬宋，寢書詔不名之命，並請求歸國。太宗自然不許，「俶不知所爲，〔臣下〕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8] 俶唯有上表獻地。三個月後，錢俶緦麻以上親及吳越官吏奉詔悉數赴闕，凡舟一千四十四艘，宗屬二千餘人，「自是子孫八十餘年不得展省于吳越，而墳廟荒蕪，父老流涕。」[9] 錢家可說是被連根拔起，要在開封自保和發展，便完全要看太宗的態度和錢氏子弟的表現了。

史》，卷67：「錢鏐」：844）可見太祖已視吳越爲囊中物。太祖又說：「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魏泰《東軒筆錄》，卷1：「錢俶初入朝」：1b）俶初次入朝是在平江南之後，《筆錄》誤記，但可以反映太祖吞併吳越之把握。事實上錢俶助攻南唐，反爲所敗，更不足以敵宋，見《宋史》，卷251：「韓令坤」：8832。

7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尚父錢忠懿王」：42；《東都事略》，卷24：「錢俶」：1a-2a；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17：5a-b：「開寶九年三月庚午」。太祖不肯扣留錢俶，大抵是因爲有誓約在先：九七五年，「太祖諭旨於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宋史》，卷480：「錢俶」：13899）又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7：66-67；葉夢得《石林燕語》，卷4：60。

8 《宋史》，卷4：「太宗」：58；《長編》，卷19：7a：「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乙酉朔」。

9 錢受徵《吳越備史雜考》：「吳越宗派考」：1b。此外，累朝誥敕、金書鐵卷，以及錢俶在吳越時所編寫的詩集《正本集》，都沒有帶到開封。

第二節　錢俶一支

太宗即位後，既要太平興國，首先要解決南方的後顧之憂，然後北伐，而錢俶在納土時表現猶豫，未免給太宗一個不識時務的感覺。[10] 表面上崇高而實則曖昧的地位，令錢俶格外「小心畏愼。每晨趨闕，蚤先至宮門假寐以待。一日，夜漏四鼓，清蹕啓行。時風雨大作，諸節鎭無一至者。太宗見王與世子惟濬，稱歎久之。」[11] 原係一國之君，現今淪爲戒愼恐懼的陪臣，心中的鬱結，可想而知。[12] 爲求自保，俶又大散錢財以奉獻貴公權臣，不料又捲入皇弟廷美的大獄中（詳後），可謂提心吊膽。事實上，錢俶歸宋後便一直患有「風疾」（即中風），太宗卻似乎並不體諒。錢俶納土後四個月，「忽染疾，」到明年（九七九）二月，已因病「拜不能起，」但太宗仍然要他在四月從征北漢。在歸途中，俶又患足疾。次年冬，太宗駕幸大名，竟命行動不便的錢俶乘肩輿即路。直到明年（九八一），俶因病勢轉劇，才得免入朝。九八五年，錢俶已不能握筆。九八

10　王夫之論之最精，他說：「僭僞向盡，〔錢俶〕乃始執玉以入庭，戀國主之尊，猶不自釋也。太宗踵立，中原大定，始捲土以來歸。宋之得之，豈錢氏之能授宋也哉！」（《宋論》，卷2：「太宗」：1a-2a）錢氏子孫所作《吳越備史補遺》，爲掩飾錢俶之遲疑觀望，將俶乞罷國封元帥等事記作「請以吳越封疆歸于有司。」其後正式上表納土，則記作「王再上言請之。」（10a-11b：「太平興國元年四、五月」）其後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指出錢氏曾有稱帝等事，弄致歐陽與錢家反目。見錢肅潤〈吳越備史後序〉（在《吳越備史雜考》後）：1a-3b；錢世昭《錢氏私誌》：「歐文忠任河南推官」：5a-6a。關於稱帝事，參考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15：「吳越武肅王廟碑」：15a-16b；趙雅書〈五代吳越國的創建者：錢鏐〉。有關歐陽與錢的交惡，見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140-141：註37；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97：「錢俶入朝」：114；朱國楨《湧幢小品》，卷14：「錢俶」：9a-b；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22：172。

11　《吳越備史補遺》，13a-b：「太平興國四年」；時從征太原。

12　錢俶獻地，逼不得已，日後遂產生索地的故事。劉一清《錢塘遺事》，卷1：「夢吳越王取故地」：2b：「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錢俶又有詩句：「帝鄉煙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見文瑩《湘山野錄》，卷上：「錢思公謫居漢東日」：10。又參考文瑩《玉壺清話》，卷7：「開寶九年」：68-69。

七年，太宗明知俶久病未痊，在特免陛辭的同時，卻又強要他以許王的新封出鎮南陽。明年，又「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墜正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年六十。」錢俶死後，不得歸葬，埋於洛陽。[13] 明代史評家張溥將錢俶與先納土的陳洪進比較，感歎地說：

> 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鸇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盡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14]

錢俶既然在歸宋後久病，支撐門戶的責任就落在下一代的肩上。俶有八子，第六子入宋後爲僧，其餘是惟濬、惟治、惟渲、惟灝、惟濯、惟演、和惟濟。他們歸宋時，除了惟濬和惟治年齒較長外，其餘都在二十三歲以下，惟演和惟濟更不過一至二歲。他們都沒有舉進士，惟渲、惟灝、惟濯的事蹟更無可考。

世子惟濬歸宋時才二十三歲，此後這位貴公子便生活在疑慮之中。九八一年，醉酒的內侍趙海到王府請見，侍從以爲他係奉旨而來，不敢查問。趙海請錢俶服下他帶來的藥丸，俶立刻照辦，「諸子孫及左右惶懼憂駭，計無所出。海既去，家人皆泣，蓋有所疑也。」後來趙海被太宗處罰，俶亦不死。[15] 九八二年，皇弟廷美被誣告圖謀不軌，獄興，宰相趙普乘機構陷與廷美友善的執政盧多遜，一再要求錢家將過去給盧多遜的餽贈列狀上陳。錢俶不肯，惟濬則認爲趙普的要求可能出於太宗授意，如不照辦，恐怕有不測之禍。俶把所有案帳焚毀，但有司按驗，還是查出錢俶和惟濬都曾經厚贈廷美，不過當下沒有入罪。[16] 惟濬

13　以上參見《宋史》，卷480：「錢俶」及《吳越備史補遺》。《補遺》：20a，記錢俶「風恙復作，四鼓而崩。」有關錢俶的謚號，見《宋史》，卷267：「張洎」：9209-9210。

14　陳邦瞻、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卷11：「吳越歸地」：55；《邵氏聞見後錄》，卷22：173。不過，俶曾貢駑馬賀太宗郊祀，見《長編》，卷22：16a：「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戊辰」。

15　《吳越備史補遺》：15a-b：「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宋史》，卷480：「錢俶」：13908。

16　錢惟演《家王故事》：「焚案帳」：31a-b；《宋史》，卷480：「沈承禮」：13918；《長編》，卷23：5a：「太平興國七年四月丙寅」。事實上錢俶的獻金多

盡意討好太宗，進獻的金銀珠寶以數十萬計，卻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一次進女樂，還被太宗拒絕。他在吳越時「放蕩無檢，」大抵難以討好注重家教的太宗。[17] 錢俶死後三年，三十七歲的惟濬也「暴卒」。[18] 惟濬六子，都以蔭補授武官：守吉官至西京作坊使，守謂至西府供奉使，事蹟均不詳。守讓則閉門苦讀，又屢獻歌頌，但始終不能由武入文，在眞宗時曾勾當行在軍器衣甲，官至東察院使。守讓子恕，娶眞宗姪女，在仁宗時爲承祐勾當庖務。[19] 很明顯，守讓父子皆以武官資格當差，雖與宗室通婚，但職位都不高，不足以振興家族。惟濬其他三子的事蹟均不詳。

惟治歸宋時是三十歲，他原是遜王錢倧的長子，自小就過繼。惟治果敢公正，甚得錢俶器重，曾從征南唐，在俶入覲太祖和太宗時，又綜理國政。對宋來說，他也立有大功。九七九年初，太宗親征北漢（劉繼元），久攻始下，至是，才體會到吳越和平納土的貢獻。[20] 太宗對從征的錢俶說：「卿能保全一方以歸

少有逼不得已的成分，如廷美屬下「閻懷忠嘗爲廷美詣淮海國王錢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宋史》，卷244：「魏王廷美」：8667；卷264：「盧多遜」：9120）俶的家財應有不少花在此類政治獻金上。

17 太宗重家教，例如特旨召見賈黃中和蘇易簡的母親，就是因爲她們教子有方；把趙州主簿王著遷爲著作郎充翰林侍書，也是因爲他有家法。太宗本人也訓子，曾長篇大論地誡詔諸子節儉愛民。又一次，御史中丞彈劾太宗次子開封尹元僖不職，元僖向太宗投訴說：「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太宗堅持朝廷官制不能違反，並且說：「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汝爲開封尹，可不奉法耶。」遂論罰如式。分見《長編》，卷23：8b-9a：「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卷29：2a-3a：「端拱元年二月」，9a：「端拱元年閏五月」，卷32：10a：「淳化二年九月丁丑」，卷34：10a-b：「淳化四年十月辛未」，卷36：12b-13a：「淳化五年九月壬申」；《宋史》，卷480：「錢惟治」：13912。

18 《宋史》，卷480：「錢惟濬」：13910。

19 《宋史》，卷245：「楚恭惠王」：8704-8705，卷480：「錢惟濬」：13909-13910；徐松《宋會要輯稿》，「刑法」：6：13a，「職官」：4：40b。錢木父《吳越錢氏續慶系譜》（以下簡稱《續慶系譜》），卷11：14a-b，卷13：10a。

20 正如蘇軾日後所說：「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河東劉氏，百戰死守，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見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55：「錢氏表忠觀碑」：總頁313-314。

我，兵不血刃，深可嘉也。」[21] 其中，又要數留守吳越的惟治最爲可嘉，因爲他沒有負隅頑抗，並且合作和妥善地交出政權。[22] 此外，本身是書法能手的太宗十分欣賞惟治的草書，以爲是諸錢之首。惟治爲討好太宗，曾獻上鍾繇、王羲之、和唐玄宗的墨寶凡七軸，但只得到「優詔褒答。」九八六年，太宗終於派他出知軍府。兩年後，惟治還京料理父喪，從此久病在家。過了三年，惟濬也死了，惟治的責任更大，但「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咸平初（九九八～一〇〇三），僮奴以姦私殺人於庭，事連閨闈。眞宗爲停按鞫，止授右監門衛上將軍〔原係節度使檢校太師，故係連降十等〕，其子駕部員外郎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23] 惟治有兩子，丕和出繼的正，在這個情況下，除非錢丕能夠出人頭地，否則難以挽救家門的不幸。

錢丕在九八五年中進士，曾外任知縣、知州，在眞宗時累遷駕部郎中、將作少監、三司戶部判官，卒於正六品的光祿少卿。他雖然知道世易時移，不能單靠恩蔭，必須憑藉科舉才容易出人頭地，但畢竟仕宦平平，無補於中落之家道——「俶歸朝廷，從千餘口，後多貧悴，會〔眞宗〕車駕出，宗族數百人訴於上，上令以米二萬石付惟治給之。」[24] 惟治卒時，子孫甚衆，婚嫁闕乏；眞宗知道家貧的官員不願負擔官給喪事，乃罷詔葬之殊榮。[25] 爲錢氏子孫者，能不感傷？

21　《吳越備史補遺》：13b：「太平興國四年」。參考《宋論》，卷2：「太宗」：1b-2a的分析。王銍《默記》，卷上：5：「先子言，錢俶所以子孫貴盛蕃衍者，不特納土之功，使一方無兵火之厄，蓋有社稷大勳，雖其子孫莫知之也。從太宗平太原，既擒劉繼元以歸，又旁取幽燕，幽燕震恐。既迎大駕至幽州城下，四面攻城，而我師以平晉不賞，又使之平幽，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時俶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按後軍徐行，故鑾輅得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虜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俶之功也。」《長編》不記其事，參考同書卷20：9a：「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癸未」。

22　宋平江南時，諸州郡皆降，獨江州死守，被宋師圍攻四餘月始陷，資財蕩然，屠戮甚衆。惟治則奉兵民圖籍、帑廩管籥以授宋師。《宋史》，卷480：「錢惟治」：13911。

23　《宋史》，卷480：「錢丕」：13913。

24　彭百川《太平治蹟統類》，卷2：「太祖太宗收復吳越」：24a。

25　《長編》，卷83：2a：「大中祥符七年七月辛卯」；《宋史》，卷480：「錢惟治」：13912。

爲挽救夾道乞憐、面臨破落之家族，錢惟演遂另闢蹊徑，實行以政治婚姻彌補家世、恩蔭、和科舉之不足恃。當時，失國的陰影已逐漸消失，在太平盛世中成長的年青一代，可以開放進取，這是惟演與諸父兄主要的不同。

新皇帝眞宗主要是一位守成的君主。自從宋與契丹在一〇〇五年締結澶淵和約後，眞宗爲政更傾向於清靜無爲，追求刑措不用的太平盛世。[26] 這樣的環境，正好讓文人書生大顯身手。此外，眞宗的作風尙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他感歎世家大族的沒落，希望幫助他們。即位不久（九九九），他便敘錄功臣子孫之無祿者，一〇〇八年又錄諸國後人。對於錢家，眞宗說：「一門忠孝，與常人異，……朕安敢忘。」可謂青眼有加。[27] 第二，眞宗好文。即位後才兩個月，他便擢用以文學著稱的梁周翰和楊億。不久，又設置翰林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錄用白居易的後人等。[28] 這傾向對錢家的保存和惟演的仕進十分有利。

---

26 太宗晚年，就是如此。九九三年，他說，「清靜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務自有爲以至于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長編》，卷34：12b：「淳化四年閏十月丙午；又見同卷13b：「十一月丙寅」；卷35，8b：「五年二月己酉」）眞宗承之，「初聽政，務從簡易」，「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上曰：先帝賜名〔恆〕之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因涕泣沾衣。」（《長編》，卷41：5b：「至道三年五月壬申」；卷42：7b：「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顧命的宰相呂端，也是以「清靜簡易爲務。」（《長編》，卷37：5a-b：「至道元年四月癸未」）一〇〇六年，眞宗自滿地說：「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長編》，卷64：2b：「景德三年九月癸丑」）又說：「祖宗闢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一〇〇八年，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一〇一二年，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爲之要。一〇一四年，河南府奏：獄空，有鳩巢其戶，生二雛。（以上見《宋史》，卷7、8：「眞宗」：131，136，148，156）王稱就說：「宋興承五季之餘，天下得離兵革之苦。至眞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成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東都事略》，卷5：「眞宗」：9a-b）

27 《長編》，卷63：19a：「景德三年八月乙酉」；卷87：12b：「大中祥符九年七月甲子」；卷96：24a-b：「天禧四年潤十二月乙卯」；《宋史》，卷6、7：「眞宗」：108，109，110，138，140。《玉壺清話》，卷4：37：「李密學濬」。

28 太宗是位附庸風雅的皇帝。九八四年，太宗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院，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九九三年，太宗幸秘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召馬步兵都虞侯傅潛，前都指揮使戴興等飲宴，縱觀群書，「上意欲武將知文儒之盛也。」（《長編》，卷25：5a：「雍熙元年三月己丑」；卷33：6b：「淳化三

眞宗沒有建國艱辛的回憶，惟演也沒有去國之痛的體驗，但他卻憧憬著宮廷的綺麗風光。有一次，惟演、楊億、和劉筠唱和，述前代掖庭事，而且詞涉浮靡，被御史告發。眞宗沒有介意他們緬懷或者空想前代事，只告誡他們身爲詞臣，係學者之宗師，切忌流宕。[29] 眞宗態度開明，惟演對錢家也產生了一個特別的期望。一〇二三年，他請求以錢俶配享帝廟時，就強調父親「親率王徒，平百年之僭僞；躬持國籍，獻千里之封疆。」而錢氏歸宋所受殊恩，「在乎皇朝，誠居第一。」[30] 換言之，錢家不應被視爲失國的降臣，而是宋朝的功臣，出力平定「僭僞」，故應得到第一等的榮譽。惟演既然希望錢家高人一等，自然致力標榜獨特的家學家傳。例如他將吳越五王的詩詞編成《傳芳集》，又遍搜遺墜，將父親的詩集《正本集》總爲十卷，增加了錢氏的文學遺產，這也就是他們入宋後一項至爲珍貴的資本。[31] 他自己撰寫《家王故事》，表揚父親的嘉言懿行，《玉堂逢辰錄》則「排日盡書其父子〔惟演與子〕承恩榮遇及朝廷盛典，極爲詳盡。」[32] 這些都可供後代炫耀門楣。宋代世家標榜家範，惟演也不例外。例如

年九月己未」）眞宗更進一步重文輕武。一〇〇二年，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闕。眞宗說：「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宋史》，卷6：「眞宗」：117）正文各條見《宋史》，卷6、7、8：「眞宗」：109，115，128，132，152，154，169（其中提到的〈崇儒術論〉，見王應麟《玉海》，卷32：3a）。《長編》，卷41：4a：「至道三年四月甲辰」；卷56：13a-b：「景德元年六月丙辰」。臣下又說：「今文章典雅，搢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長編》，卷85：23a：「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己亥」）大抵是上行下效吧！

29 《長編》，卷71：2a-b：「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巳」；鄭再時《西崑酬唱集箋注》：198。

30 《長編》，卷100：7b-8a：「天聖元年二月庚申」。

31 例如錢俶「頗知書，雅好吟詠。在吳越日，自編其詩數百首爲正本集。」惟濬之子守讓「頗勤學爲文章，退居多閉關讀書，……有集二十卷。」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慕皮、陸爲詩，有集十卷。」子丞，「幼好學。」惟濟有《玉季集》二十卷。儼「謹慎好學，……博涉經史。」昱「好學，多聚書，喜吟詠。……有集二十卷。」昭序「好學喜聚書，書多親寫。」昭度「俊敏工爲詩，多警句，有集十卷，蘇昌簡爲序行於世。」見《宋史》，卷480各傳；《吳越備史補遺》：22a。

32 《家王故事》：30a-31b；錢惟演《玉堂逢辰錄》：28b-30a；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1：「太宗既得吳越版籍」：53。惟演的著作，見《宋史》，卷202-209：「藝文」：5075，5096，5105，5119，5151，5167，5361，5370，5403；《續慶系譜》，卷11：2b；《西崑酬唱集箋注》：270-272。

他力行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33] 他更修《錢氏慶系譜》二卷，自錢鏐開始，排列至親近屬各支的傳世情況。在序中他自豪地以家族領導人的口吻說：

> 昔王謝之族，鮮有勳庸，崔盧之家，惟矜閥閱，以今昉古，豈有慚德。冀紘傳寶，用示來葉。初武肅王〔鏐〕著大宗譜書，去今一百餘年，且七世矣。惟演輒繼而錄之，復不知幾世幾年，有能嗣其事者，當屬之於其後世賢耳。[34]

後來他又藉著政治地位和眞宗的寵信來保障家族的繁榮。例如他請朝廷修葺杭州的家廟，又懇請皇帝「始終保存」錢家。在他的請求下，錢俶被尊爲尙父，又幾乎得配享太宗廟堂。他尤其關懷最年幼的惟濟。一〇一七年，他請求眞宗讓久官在外的惟濟返京，以慰兄弟之思。眞宗嘉其友愛，即日召之。其後，他又促成惟濟自觀察使轉節度觀察留後，且總要鎭定州的兵權，又推薦姪兒僊芝以前知縣事出任館閣校勘以便進入清要之途。[35] 他自己的目標則在於禮絕百僚、序班在親王之上的相位。這雖然沒有成功，但他終於成爲與宰相對掌文武二柄的樞密使，而且勳階品皆第一，是北宋諸錢政治地位最高的人。[36] 在這力爭上游的過程中，惟演既憑本身的才學，又倚賴政治婚姻的締結。

惟演「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37] 及長，勵志讀書，「坐則誦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

---

33 有關宋代家範，參考潘永因《宋稗類鈔》，卷4：「家範」。引文見歐陽修《歸田錄》，卷1：「錢思公生長富貴」：10b-11a。又參考《錢氏私誌》：「畫堂上」3b-5a。

34 《吳越錢氏宗譜》：「序」：澉江慶系譜序。

35 《長編》，卷89：17a：「天禧元年四月庚辰」，卷95：9a：「天禧四年四月丙戌」，卷96：24a-b：「天禧四年閏十二月乙卯」，卷97：14a-b：「天禧五年九月庚子」，卷100：7b-8a：「天聖元年二月庚申」，卷110：2a：「天聖九年正月辛未」；《吳越補史補遺》：22a。有關錢僊芝，又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8：97；《揮麈錄・後錄》，卷6：「曾氏一門六人同牓及第」：154。

36 《宋史》，卷317：「錢惟演」：10342；《歸田錄》，卷3：「錢思公」：4a；《東軒筆錄》，卷2：「蘇易簡」：7b-8a。宋綬等《宋大詔令集》，卷205：764。

37 《東都事略》，卷24：「錢惟演」：2b。

嘗頃刻釋卷也。」[38] 連名臣李綱也稱讚他「酣貫百氏，博洽群經；劉筠讓步，楊億齊名。」[39] 他見知眞宗，就是因爲博學能文。

一〇〇〇年，惟演亦知恩蔭之不足和重文輕武的趨向，於是以文自薦，求換文官。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40] 眞宗親覽，特授太僕少卿。一〇〇四年，惟演獻《咸平聖政錄》三卷，命直秘閣，預修《册府元龜》，這是眞宗至爲禮優的職位。一〇〇七年四月，眞宗賜錢俶守冢三戶，蠲免徭役。十月，惟演上〈景德聖德論〉，眞宗大爲欣賞，以論付史館，又替老而貧病的惟治連遷八官，月給俸錢十萬，仍許在家養疾，又索取惟治翰墨，酬以白金千兩，意在資助錢家。次年，惟演獻〈祥符頌〉，擢司封郎中，知制誥，成爲天子近臣。此後，遷給事中，「歷更清華，陞用宥密，」終於在一〇一五年成爲翰林學士，達到了文學之臣的事業顚峰。正如惟演自己所說：「玉署之設，密邇紫闥，每夜漏既上，宮鑰並入。有大號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鶡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數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重乎！」[41]

惟演的成功，固然是因爲眞宗眷顧舊族，但也因爲他本人力求上進。例如他成爲翰林學士後，更求學問上的進步，曾經自勉說：「翰林學士備顧問，司典誥，於天下之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故益儲文籍，家藏侔於秘府，於書無所不讀。南宋史學名家李燾說他「自以才能進，」確是中論。[42] 不過，惟演

38　《歸田錄》，卷2：「錢思公雖生長富貴」：3b。

39　《吳越錢氏宗譜》，卷首：「文僖思王像贊」。參考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37：「詩歌賦詠：錢惟演劉筠警句」：479-481。

40　《宋史》，卷317：「錢惟演」：10340-10342。

41　曾鞏《隆平集》，卷12：「錢惟演」：2b-3b；《宋史》，卷480：「錢惟治」：13912；《長編》，卷47：7a：「咸平三年五月丁酉」，卷61：10b-11a：「景德二伴九月丁卯」，卷62：2b-3a：「景德三年正月癸酉」，卷65：5a：「景德四年四年三月乙巳」，卷66：10b：「景德四年八月丁未」，卷68：5a：「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宋會要輯稿》，「禮」：58：86a；《宋朝事實類苑》，卷7：「君臣知遇：禮遇詞臣」：77，引錢惟演《金坡遺事》；《澠水燕談錄》，卷1：2；阮廷焯〈錢惟演金坡遺事輯〉，36。

42　《長編》，卷115：2b-3a：「景祐元年七月乙巳」；《續慶系譜》，卷11：2a-b；《宋史》，卷317：「錢惟演」：10341。

也有投機的一面。例如眞宗搞天書封禪，自欺欺人，惟演更獻〈祥符頌〉等以取寵，難怪史臣感歎「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43] 另外，他把幼妹嫁給眞宗劉皇后的誼兄劉美爲繼室，也有投機的成分。

劉皇后是被收養長大的孤兒，隨銀匠龔美到京師，被眞宗（當時是開封府尹）看中，「寵幸專房。」但因爲太宗不喜歡劉女，眞宗只好將她寄居在親信家裡。眞宗繼位，迎劉氏爲美人，并賜龔美劉姓，讓他成爲劉氏誼兄，又備加信任。[44] 錢惟演在嫁女時曾請龔美打造銀器，此時就把幼妹嫁給劉美爲繼室。[45] 一〇一二年，眞宗不顧大臣如寇準和李迪等的反對，册立劉氏爲第二任皇后，又讓她預聞國事。[46]

劉后對錢家應該具有好感。首先，她對自己寒微的出身耿耿於懷，希望與世

---

43 《宋史》，卷8：「眞宗：贊曰」：172。

44 據李燾，劉氏與龔美曾爲夫妻：「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攜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旻時給事王宮，言於王〔眞宗時爲襄王〕，得召入，遂有寵。」（《長編》，卷56：2a-b：「景德元年正月乙未」）但恐怕張不會推薦有夫之婦予眞宗。今從《宋史》，卷242：「章獻明肅劉皇后」：8612-8616；司馬光《涑水紀聞》，卷5：「貢父曰」：52；李攸《宋朝事實》，卷1：「章獻明肅劉后」:13b-14a；《東都事略》，卷13：「章獻明肅皇后」：4b-6a；卷119：「劉美」：3a-b。各書多以爲劉氏入王邸時是十五歲。如《宋史》：「后年十五入襄邸。……〔明道二年，1033年〕崩，年六十五。」若劉后死時是六十五歲，則十五歲時是九八四年，當時眞宗還沒有被封爲襄王，故不應作「入襄邸。」眞宗在九八九年爲襄王，九九四年尹開封，時劉氏二十五歲，似較合。《東都事略》記劉后死於六十四歲，相差不大。參考千葉冬，〈宋代の后妃——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四朝〉：228-233。

45 《東軒筆錄》，卷15：「錢思公嫁女」：3b。當時錢惟演父母已死，但將妹妹嫁給劉美是否惟演個人的主意，不得而知。今從《東軒筆錄》。四庫館臣稱是書「是非多不可信。」但書中稱惟演爲「思公」，大致上沒有惡意，至於所記是否準確，待考。錢、劉在九九八至一〇〇七年之間締婚。《宋史》，卷463「劉美傳」以劉后父系當作劉美父系，不確；見《東都事略》，卷119：「劉美」：3a-b。劉美第一任妻子姓宋，後追封爲河內郡夫人。

46 《宋史》，卷242：「章獻明肅皇后」：8613；《涑水紀聞》，卷5：「劉貢父曰」：52；卷7：「丁寇異趨」：70；卷8：「李文定公迪」：79；《宋史》，卷242：「沈貴妃」：8619：「帝亦以妃家世故，待之異衆。長秋虛位，帝欲立之，有從中沮之者，不果。」

家大族拉上關係，[47] 而錢氏當日肯紆尊降貴，與劉美締親，實正合其意。其次，劉美和錢氏生下二子從德和從廣，令劉家香火不斷。劉后無子，愛兩人如己出。從德又特別眷顧錢家，在遺奏中也替惟演的長子錢曖爭取升官。[48] 不過，從一〇一二年立后到一〇二〇年間，惟演在政途上只是循序漸進。他曾犯兩次小過，也沒有得到緩頰。一次是受姐夫家人受賄事之牽連而罷翰林學士年餘，一次是坐解送五名文理欠通的進士，與其他考官以知舉失實並降一官。惟演曾奏准由舍人院和館閣官員撰寫外使國宴時演奏的樂詞，後來被人指出與典故不合，眞宗沒有袒護他，下詔改正。另一次，他建議應派遣品位較高的公卿朝陵，獲得接納。從這兩次有案可查的建言來看，惟演並不與聞重要朝政。他也很謙恭，自請排班在復職爲學士的翰林老前輩楊億之下。[49] 一〇一九年，惟演「見〔新任參知政事丁〕謂寵盛，附之，與講姻好，」將女兒嫁給丁謂之子。[50] 次年，他就捲入了丁謂、寇準、和劉后的權力鬥爭中。

47　她爲太后時，看中洛陽劉燁一族。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流離飄零，爵命中絕，世系無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以下，仕者相繼，世牒具存。但劉燁不願巴結太后，過程甚爲有趣：「〔劉〕燁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尹。明肅〔劉〕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乞知河南府。再召，怨避不行，求爲留司御史台，以卒。」（《邵氏聞見錄》，卷16：「河南劉氏」：178-180；《長編》，卷103：6a-b：「天聖三年四月」；《宋史》，卷262：「劉燁」：9075。）又據稱：「章獻太后智聰過人，其垂簾之時，一日，泣語大臣曰：國家多難如此，向非宰執同心協力，何以至此。今山陵了畢，……卿等可盡具子孫內外親族姓名來，當例外一一盡數推恩。宰執不悟，於是盡具三族親戚姓名以奏聞。明肅得之，遂各畫成圖，黏之寢殿壁間，每有進擬，必先觀圖上，非兩府親戚姓名中所有者，方除之。」（《默記》，卷上：「章獻太后」：10）未嘗沒有抑制門第勢力的用意。

48　《宋史》，卷297：「曹修古」：9891；卷463：「劉從德」，「劉從廣」：13550-13551；《長編》，卷110：17b：「天聖九年十一月乙未」。

49　《西崑酬唱集箋注》：249-250；《長編》，卷86：10b-11b：「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壬子」；卷93：6a-b：「天禧三年三月癸未」；卷94：13b：「天禧三年十二月丙午」；卷95：8a-b：「天禧四年四月壬午」，9a-b：「四月丁亥」，17b-18a（小字）：「六月丙申」。《宋史》，卷123：「禮」：2884；卷277：「慎從吉」：9446；卷288：「趙稹」：9682。惟演《宋史》本傳則將罷翰林學士之原因稱爲「坐私謁事。」（卷317：10341）

50　《東都事略》，卷24：「錢惟演」：2b。

政局不穩是由於眞宗久病，大權落在劉后手中。宰相寇準與劉后和丁謂不協，於是密謀以太子監國，奪劉后之權，去丁謂及錢惟演等人之位。事洩，丁謂和惟演聯手擊倒寇準，惟演又乘眞宗補相時成功地推薦丁謂爲首相，本人也由翰林學士變爲樞密副使。後來丁謂與另一位宰相李迪相攻，被眞宗一齊罷免，丁謂後因惟演代爲說項而得以復相，李迪卻因曾經得罪劉后而終於外貶。[51] 政治婚姻的意義，本來就是互相看中對方的潛力，希望利用這潛力互相幫助。令錢惟演想不到的，是丁謂隨即身敗名裂。

一〇二二年春，十二歲的仁宗繼位，劉后垂簾，大臣輔政，惟演晉升爲樞密使。不久，丁謂逐漸專權，與劉后產生磨擦。丁又交結內侍雷允恭，探聽內廷動靜。不料雷允恭擅移眞宗皇堂，而丁謂意圖包庇。事發，允恭伏誅，執政王曾乘機攻擊丁謂「包藏禍心。」劉后召集丁謂以外的宰執會議，並且率先斥責丁謂身爲宰相，竟交通內侍，聲稱要誅殺丁謂。大臣看風駛舵，除參政任中正外，群起攻丁。原先答應丁謂盡力維護的惟演「慮幷得罪，遂擠謂以自解。」總之，在這次權力鬥爭中，劉后決意驅逐丁謂，而大臣各懷私意，乘機附和，只因丁謂「多陰謀，得政歲久，要不可測。雖〔王〕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事實上是有點過份。丁敗，抄家；任中正「坐營救丁謂，」外放。[52] 惟演也一下子由權臣的親家變爲罪臣的累姻。不久，宰相馮拯便排擠惟演，指「惟演以妹妻劉美〔卒於一〇二一年〕，實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53] 太后遂拜惟演節度使出知河陽。

---

51 本文主要根據《長編》，卷95至100，天禧四年至天聖元年七月有關各條；《宋史》眞宗本紀及有關人等傳記；《太平治蹟統類》，卷5：「丁、寇南遷之禍」，卷6：「莊獻皇后」；《宋史紀事本末》，卷23：「丁謂之姦」，卷24：「明肅莊懿之事」；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23：「丁謂事跡」，卷24：「周懷政陰謀廢立」，「雷允恭擅易皇堂」，卷33：「追尊莊懿太后」，卷34：「外戚驕橫」，卷36：「錢惟演改判河南」；洪邁《容齋隨筆》，卷8：「眞宗末年」：109-110。

52 《長編》，卷98：15a-17a：「乾興元年六月庚申、丙寅」，卷99：8b：「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卯」；《宋史》，卷285：「馮拯」：9611；《默記》，卷上：9-10。

53 《長編》，卷99：8b-9a：「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卯」。

錢惟演以后戚參政，實不無斡旋內外廷之功。一〇二一年初，「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54] 而且，宋初對外戚，是「其間有文武才謂，皆擢而用之，」並無不可預政之說。直到一〇五〇年底，仁宗才下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職任。」[55] 再者，太后垂簾，惟演輔政，已經九個多月，馮拯未免是舊事翻新。他排斥惟演，據稱是因爲厭惡惟演對丁謂反覆。但此理由亦頗爲牽強：若丁謂罪至於貶，則惟演是重政事之公而輕戚誼之私，不算反覆；若丁謂罪不至此，則馮拯也曾倒丁，是與惟演同科。也許正因爲是後者，故馮拯只能以「親嫌」爲惟一理由。

以「親嫌」爲名，在當時不失爲一有力武器。劉后是宋代第一位垂簾的太后，正要建立威信，「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左右近習，亦少假借。」她「晚稍進外家，」但在早年不能不避嫌，以示大公。[56] 再說，宋臣亦恐怕后戚勢力過盛，威脅帝室，故必須防微杜漸。例如惟演到河陽後，請額外賞賜鎮兵，立即就被御史彈劾，理由是「賞罰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即位，惟演連姻后家，乃私請偏賞，以自爲恩，必搖衆心，不可許。」[57] 這雖然是小題大作，但可以反映臣下的疑慮。在太后避嫌和臣下戒懼的夾縫中，惟演便不能久安於位了。

惟演雖罷政，但並未失寵。免任的制詞就體貼地將一切歸究於「葭莩聯戚，緣避於嫌疑。」最後並安慰他：「汝無墜於家聲，惟明哲可以保厥身，惟靖共可以綏厥位。」[58] 劉后又把他排班在資深節度使柴宗慶（後周宗子）之上，表示

54　《長編》，卷96：25b-26a：「天禧四年閏十二月庚午」；《宋史》，卷310：「王曾」：10183-10184。

55　《宋史》，卷463：「外戚」：13535；卷12：「仁宗」：230。

56　《宋史》，卷242：「章獻明肅劉皇后」：8614，8615。

57　同53。

58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卷4：「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卯」：6b-7a。

優渥。其妹（劉美寡妻）亦得晉封越國夫人。[59] 惟演長子曖，娶仁宗郭皇后妹（郭后立於一〇二四年），次子晦，娶太宗外孫（一〇二六年），也都在劉后攝政期間。[60]「其族植笏而通省戶者以百數。門闌廝役，青紫群列，號爲貴顯。」[61] 一〇三一年，甥劉從德死，恩蔭且及錢曖（見上文）。恩眷既然未衰，惟演又不甘於無辜罷政，於是屢謀復出，但每次都因他的婚姻關係而成爲言官的口實。

第一次企圖復出是在罷政後一年（一〇二三）。惟演由河陽徙知亳州，入京師，謀相位。監察御史鞠詠彈劾他「憸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惟演顧望不走，鞠詠與左正言劉隨聯絡，聲稱「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去。[62] 第二次是在一〇三一年。惟演稱疾，入朝，又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說：「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惟演不得已，請改判洛陽，可照料父親墓塚，太后照准。殿中侍御史郭勸又請罷惟演弟惟濟節度觀察留後的新任及兵權，太后不許。[63] 惟演在洛陽，招納名士謝絳、梅堯臣、尹洙、和歐陽修等至幕下，「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64] 但惟演念念不忘入相。第三次是在一〇三三年。他先求侍祠，留在京

---

59 《長編》，卷99：10b-11a：「乾興元年十一月辛未」，卷100：6a：「天聖元年正月庚寅」。

60 《宋史》，卷317：「錢惟演」、「錢晦」：10341，10342，卷246：「荆國大長公主」：8774-8775，嫁女時爲冀國大長公主，見《長編》，卷104：3a：「天聖四年二月己未」。《宋會要輯稿》，「職官」61：7b。

61 蔡襄《蔡忠惠公集》，卷35：「延安郡主李氏墓誌銘」：6b-7a。

62 《長編》，卷101：2a：「天聖元年八月甲寅」。

63 《長編》，卷103：19b：「天聖三年十二月乙丑」，卷110：2a：「天聖九年正月辛未」。《宋史》，卷297：「郭勸」：9892。惟演在洛陽時仍相當恃寵，甚至敢於格詔書不下，見《宋史》，卷299：「孫祖德」：9928。

64 《宋稗類鈔》，卷1：「錢文僖惟演」：75，卷5：「錢思公鎮洛」：371；《東軒筆錄》，卷3：「錢文僖公」：5a-b；《澠水燕談錄》，卷4：40；《邵氏聞見錄》，卷8：「天聖明道」：81-82，「謝希深歐陽永叔」：82-83；《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133-136，141，註37；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5：「送徐生（無黨）之澠池」：總頁79上；《春明退朝錄》，卷中：「天聖中」：23；吳曾

師。不久，劉太后死，仁宗下令他回洛陽。「惟演欲爲自安計，」建議將劉后和仁宗生母李后幷配眞宗，「以希帝意〔按：劉后死，仁宗始知生母爲李后〕。」惟演又企圖與李后族人聯婚。御史中丞范諷遂劾惟演不當擅議宗廟，又言「惟演在章獻〔劉后〕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郭皇后〕連姻，請行降黜，」並以去就爭，甚至說：「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實不無誇張之嫌。結果惟演落平章事，子曖奪一官，隨父到河南，其餘諸子亦被逐離京城，悉補外州監當，可謂滿盤皆落索。[65] 惟演的謫詞係從兄錢易的親家盛度所撰，警句是「三星之媾，姑務結於戚籓，百兩所迎，率相依於權利。」斥責惟演是利用婚姻，唯權利是圖的投機分子。[66] 惟演回到洛陽，「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昔年多病厭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淺。」次年便去世。[67] 太常博士張瓌以惟演「附援求益，迎合輕議，……貪慕權要，」議謚號曰「文墨」，取「貪而敗官曰墨」之意。錢家不平，撾登聞鼓上訴。太常禮院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改謚曰思。」到一〇四五年，劉、李二后升祔眞宗廟，應了惟演當年之請，錢曖乃復訴前議，改謚「文僖」。一〇四七年，追復平章事。[68]

惟演一生，實無大過。他一心要使錢家成爲「本朝第一」，又要自己成爲萬人之上的宰相，故在選擇婚姻對象時，以皇族權臣爲先。他既然投資在劉后和丁

《能改齋漫錄》，卷11：「錢文僖賦竹詩唱踏莎行」：328。《宋史》，卷286：「王曙」：9633；卷443：「梅堯臣」：13091-13092。從引述之衆多，可見時人對惟演的風致十分欣賞。

65 惟演還貢牡丹，「有識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見蘇軾《仇池筆記》，上：「萬花會」：209-210。《宋史》，卷109：「禮」：2617-2618；卷242：「劉皇后」：8615-8616；卷304：「范諷」：10062；卷317：「錢惟演」：10341-10342；《長編》，卷113：4a-b：「明道二年八月丙寅」。哲宗時，劉安世說：「惟演位兼將相，言之未爲大過，而責之如此之重者，乃所以嚴宗廟也。」（《長編》，卷418：「元祐三年十二月甲午」：2b-3a）有謂仁宗罷惟演是因爲他是劉太后所任用，見《宋史》，卷468：「閻文應」：13655。

66 《宋大詔令集》，卷205：764；《東坡志林》，卷2：「記盛度誥詞」：52-54。

67 《湘山野錄》，卷上：「錢思公謫居漢東日」：10。

68 《長編》，卷115：13b：「景祐元年十月辛酉」，卷161：8a：「慶曆七年十一月己卯」；《宋會要輯稿》，「禮」：58：86a-87a。

謂身上，便不能不介入他們與寇準的鬥爭。政爭得勝之後，惟演也由翰林學士搖身一變成爲樞密副使，此雖不乏先列，[69] 但未免給旁觀者一個惟演「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的印象。在丁謂和劉后的衝突中，丁由權臣一仆而成罪臣，連累惟演也被視爲「孽臣之累姻。」[70] 惟演排丁以自解，又落得「憸險」的惡名。如此，錢惟演實已無入相的希望。抨擊者如范諷、鞠詠、劉隨、和郭勸等，都不值丁謂或其同道所爲。鞠、劉、和郭等更以裁抑貴戚爲己任。[71] 遇到這些言官，加上劉后避嫌，「示天下以不私，」則惟演去位，實屬難免。但他的恩眷不衰，又給人一個「惟演在章獻時權寵太盛」的感覺，更要防止他復出。惟演三次求入，更固定了他爲求權利，不擇手段的形象，累及後代。明代何喬新盛讚惟演博學能文，但也惋惜地說：「顧乃附麗憸壬，連媚戚畹，以求遂其所志。卒之政府不可入，而其播惡聲於無穹。」[72] 可見政治婚姻有利亦有弊的一面。

幼弟惟濟也有殘忍和揮霍的惡聲。他一生能夠飛黃騰達，主要是靠眞宗和劉太后的蔭庇。他能射，自詡有將帥才，並自請試郡。留下來的治績，幾乎全都與刑獄有關。首次知州時，他就以偵破盜賊反誣受害人案得到眞宗賞識，預言他「後必爲能吏矣。」想不到他後來卻成爲酷吏，「所至牽蔓滿獄，凡重囚棄市，或令人斷手足、探肝膽，加備諸毒，用以威衆，觀者莫不色動，而惟濟自若。」在定州，有婦人虐待繼子，「惟濟取其所生兒置雪中，械母使視兒死。」其慘毒多此類。[73] 他又好大排宴席，弄到家無餘貲，而且欠下公使錢七百餘萬。公使錢是路和州宴請和餽贈官員任免和來回京城的費用，雖在制度上出於政府的資助，但實際上有不少斂自民間。惟濟透支的數目，由後任填補，免不了向民間增收。他則逍遙法外，因爲太后「一切貸之，」還特賜白金二千兩補助家用。一〇

69 梁天錫《宋樞密院制度》：192-198。

70 《宋史》，卷286：「蔡齊」：9367；《湘山野錄》，卷上：「時大臣爲樞相」：10。

71 《宋史》，卷297：「論曰」：9897-9898，「鞠詠」：9886-9888，「劉隨」：9888-90，「郭勸」：9892-9894，卷304：「范諷」：10061-10064，卷330：「張璪」：10625-10626。

72 何喬新《椒丘文集》，卷5：「史論：宋：錢惟演」：6a-b。

73 《宋史》，卷480：「錢惟濟」：13913-13914。

三二年，他以久官在外，請入覲，得病，卒於年底，太后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遣使護葬。[74] 惟濟子睽，官至中大夫，事蹟不詳。睽有三子，長子禹卿以父蔭爲太廟齋郎，中舉，官至正八品的通直郎，曾通判霸州和環州，都是西北要衝；有二子一女，女嫁進士石仲堅。次子唐卿，曾任山南道節度推官，事蹟不詳。[75] 三子長卿走的路子很像惟演和曖。在神宗時以著作郎爲編敕刪定官，同編修《武經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册。獻文，得神宗賞識，自朝奉郎擢爲校書郎，嘗撰答高麗國書，於哲宗時除集賢院校理，可說歷任館職和「近上職名，」後至樞密院編修。似乎惟濟的後人已脫離了武官系統，而且想辦法走清要的路。[76]

惟字輩中，就以上述的惟濬、惟治、惟演、和惟濟較爲知名。惟灝在一〇一八年以團練使知和州，上表自陳去京太遠，改知漣水軍，[77] 從此不聞。他的請求和惟濟久官在外的情形一樣，說明世家大族的子弟因出仕地方而四散，有些甚至就地定居，脫離祖籍（見下文）。出任甚至終老外官的子弟愈多，家族離散的情況就愈嚴重。就錢家來說，最好有領袖級人物在開封坐鎮。

惟演有十一位兒子，長子曖、次子晦、和六子暄的資料較多。從曖和晦身上，可看到惟演安排家族在內、外廷雙線發展的計劃。他希望曖走自己以清要官爲踏腳石的路。一〇一八年，曖獻〈醴泉賦〉，召試，賜進士及第，授光祿寺丞。一〇二〇年，從惟演奏請，「詔特與館閣校勘，餘人不得援例。」次年進秘書郎，一〇二五年前後娶仁宗郭皇后妹，到一〇三一年已是集賢院校理。但是錢曖的館閣前程，卻因父親的被黜而中斷。一〇三三年被逐離京師，隨惟演到洛

74　《長編》，卷73：20b：「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丁未」，卷84：12b-13a：「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壬戌」，卷89：16b-17a：「天禧元年四月庚辰」，卷90：7b：「天禧元年八月庚午」，卷111：5a-b：「明道元年四月戊午」；《宋史》，卷10：「仁宗」：195。又見《宋會要輯稿》，「刑法」：4：8a-b。惟濟的年譜見《西崑酬唱集箋注》：91-288。

75　勞格〈宋人世系考〉，卷10：7a-b；晁補之《雞肋集》，卷65：總頁512：「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

76　《長編》，卷216：15b-16a：「熙寧三年十月丙戌」，卷341：4a：「元豐六年十一月丁巳」，卷391：13b：「元祐元年十一月丙子」。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卷1：51b：「編修錢先生長卿」。

77　《長編》，卷92：8a：「天禧二年八月壬子」。

陽。同年，郭皇后被廢。到一〇四六年，判三司開拆司，又坐妄奏班行受贓，追二任官，勒停。[78]

錢晦娶的是太宗外孫，甚得眞宗鍾愛。成婚不久，惟演就替晦奏請由文官的大理評事換武官的內殿承制。眞宗以姻戚關係，「特從其請」。內廷行走是皇親國戚和品位崇高的文武大臣子弟的「特權」，而錢晦的家世使他能夠享受供職內廷的種種好處。首先，一般士大夫不會因爲他不是科舉出身而加以歧視，而他也頗維護他們。有一次，晦就阻止兩使留後宦者王守忠在國宴時排座在朝臣之上。其次，他容易接近皇帝。在一次「侍燕閒談」時，他談到錢家的歷史，引起仁宗對唐昭宗賜給錢鏐的鐵券感到興趣。錢晦乘機把太祖、太宗、和眞宗所賜的御書一齊進呈，「上皆親識其末。」事實上，仁宗有意扶植他，先後派他出知河中府和秦鳳路馬步軍總管等位處要衝的職位。第三，大臣也在有需要時拉攏他。曾有某位參知政事便引他相助，趕走政敵。第四，由於內廷行走主要在中央任職，故錢晦大部分時間能夠留在家族根據地，維護錢家的地位。總的來說，錢晦官運亨通，差兩等便成爲最高的節度使。單憑妻子一個月六萬至十萬的俸錢，一家就可以安樂過日。[79] 三子：景初中嘉祐六年（一〇六二）進士，授正議大夫，官至光祿寺丞。次子景裕，官至大理評事。三子景祥爲右宣德郎，入元祐黨籍，其女則嫁與宗室。[80]

錢暄在父親去世時只有十七歲，「少以文學有聲場屋間，」但沒有中舉，以父蔭入官。知台州時，治水患有功，大受神宗賞識，擢爲鹽鐵副使，屢建嘉謨。

---

78 《宋會要輯稿》，「選舉」：9：2b，33：3a；「職官」，64：52a；《長編》，卷97：11a：「天禧五年八月丙午」，卷113：4a-b：「明道二年九月丙寅」，卷157：16a：「慶曆二年六月丙子」。

79 《宋史》，卷317：「錢晦」：10342-10343；《蔡忠惠公集》，卷35：5b-8b：「延安郡主李氏墓誌銘」；《長編》，卷104：3a：「天聖四年二月己未」，卷159：4b：「慶曆六年七月己未」，卷160：3a：「七年二月丙午」，卷168：4b：「皇祐二年三月己酉」，卷175：11b：「五年八月庚午」。《吳越備史雜考》：「鐵券考」：6a。

80 〈宋人世系考〉，卷10：5b-6a；錢文選《錢氏家乘》，〈支派〉：5a；范祖禹《范太史集》，卷48：3a：「左班殿直妻錢氏墓誌」。

一〇八四年，錢暄以知州除寶文閣待制，代表具有顧問皇帝的資格，這對非由進士出身的錢暄來說，實屬殊榮。神宗還特別聲明：「暄爲郡有聲，朝廷自以才用。」可惜明年即卒，仕宦僅至安撫使。[81]

神宗也要看錢家的鐵券。他把皇姑下嫁給錢景臻後（見下文），特別關照錢家。例如替錢氏族譜寫序，派惟演第十子錢喚知眞州，好讓他「治民之餘，得以瞻望父祖之故國。」其弟錢曜在仁宗「錄諸國後」時入內廷供職，在一〇七九年出任都水監幹當公事，參予黃河的水利工程。但神宗恐怕他「新作水官，未歷河事，」特別派他的下屬代行若干苦差。曜在哲宗時官至河北西路提點刑獄。[82]根據《皇宋十朝綱要》，錢惟演沒有一個兒子當上知制誥、中書舍人、或翰林學士這些清要官。曖和暄皆走外廷、而晦、喚、和曜均曾於內廷供職。暄曾經權鹽鐵副使，後來與曜先後成爲路級長官，使錢氏在中央和地方都佔有要職。他們雖然沒有惟演的貴顯，但成就則在惟濟之上。創業難，守成更難，他們是守住了，但所憑的不盡是科舉恩蔭，當還有政治才幹，內外廷雙線發展的策略，和婚姻關係。

錢氏下一代中知名的人物有景謙和景臻。景謙是曖的次子，共有八位兄弟，本人由蔭補入武官，後試進士，入第，極得考官王安石的欣賞，而景謙亦對王安石執弟子之禮。安石提點畿內時，又力薦景謙於公卿間。景謙出名卻是因爲以這樣密切的關係而始終不肯依附王安石推行新法以獵取高位。王安石在景謙居喪期間還訊問他對青苗和助役錢的意見，並請他推薦可用之人。安石爲相，「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但景謙推卻這個士人夢寐以求的清職，並且表明立場：「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安石再請他幫助推行新法，景謙還是婉

81　《范太史集》，卷42：「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誌銘」：1a-4b；《宋史》，卷317：「錢暄」：10343；《吳越錢氏宗譜》：「渻江慶系譜圖」：4a-5a；《續慶系譜》，卷11：11a-b；《長編》，卷349：1b：「元豐七年十月己巳」；〈宋人世系考〉，10：6a-b。

82　《吳越錢氏宗譜》，卷首：6a-b，蘇轍《欒城集》，卷29：「錢喚知宜州」：總頁292上；《宋會要輯稿》，「崇儒」：7：75a，「方域」：15：5a；《長編》，卷323：14b：「元豐五年二月丙子」，卷359：2b-3a：「八年八月癸酉」，卷450：10a：「元祐五年十一月甲戌」。

言拒絕。「安石大怒，坐上數十人，皆爲之懼。」得罪權傾一時的王安石和不肯附和新法，仕進自然無望，景諶甚且不敢留在京師，終身爲外官，家道亦走下坡，「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藐然，未畢婚嫁。」。他僅至正七品的朝請郎而卒，失去恩蔭資格。[83] 在宋代的奪宗法下，[84] 錢曖一支雖然是長子嫡孫，但因家道中落，只有將宗子之位讓與興旺的錢暄一支。

錢暄的妻子是右殿班直胡賁之女，當她在七十六歲（一〇九〇）去世時（暄在六年前已卒），十個在世的兒子中只有四個出仕，職位不過是推官（二人）、縣令、和右班殿直；死去的二個兒子也只是縣尉和右奉議郎，而暄「不殖財產，累官列卿而家甚清約。」這一代在仕宦不振和經濟拮据的情況下還能夠支撐門戶，主要是靠世家大族的餘蔭。第一是恩蔭：十二子都補官領俸。第二是與名族聯婚：長女即嫁給宰相呂公著之子希績。最後而且最爲關鍵的，是能夠再次與皇室締婚：繼錢晦尙太宗外孫之後，錢暄第九子景臻又尙仁宗第十女。[85]

大約在一〇七五年，神宗吩咐宰相王珪替二位皇姑物色夫婿，條件是「勳賢之後有福者。」這樣的人選實不易得，王珪竟無以應命。是時，景臻補試入太學，與王珪子仲修同齋。仲修見景臻「風骨不群，文采富贍，」遂向父親推薦。王珪設宴招待齋中所有學生，藉此觀察景臻，又叫兒子把景臻的作業偷來進呈。據說神宗「見其名氏，曰：此大勳之後，忠孝之家，當無以踰矣。」於是召見，

---

83 《宋史》，卷317：「錢景諶」：10348-10349；《邵氏聞見錄》，卷12：「錢朝請者名景諶」：132-135。

84 奪宗法見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98-114。

85 《宋史》，卷20：「徽宗」：380；卷22：「徽宗」：413；卷166：「職官」：3946-3947；卷242：「周貴妃」：8623-8624；卷248：「秦、魯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8777；卷465：「錢忱」：13588-13589；《宋會要輯稿》，「帝系」：8：50b-51a；《吳越錢氏宗譜》，卷首：4a-5b；《續慶系譜》，卷11：1a-b；《長編》，卷273：7b：「熙寧九年二月戊戌」；《錢氏私誌》：「某向聞父兄說」：1a-2b，「賢穆乳母」：2b-3b，「忠懿歸朝」：3b-4a，「親王宰相使相」：6a；《范太史集》，卷42：「安康郡太夫人胡氏墓誌銘」：1a-4b。參見《揮麈錄・前錄》：卷2：「唐朝」：21，卷3：「吳越國」：23；《後錄》，卷7：「唐質肅公孫女」：171。莊季裕《雞肋編》，卷中：24b-25a。

一共三人，其中一位是曹詩，就是眞宗所稱的武臣世家曹彬的第四代孫。[86] 神宗和兩位長公主隔簾相親，主要不過看看樣貌風度。神宗還到簾外「熟視。曰：簾外與簾內一般。」結果曹詩和景臻入選。[87]

此時長公主生母周妃猶在，本人又是皇帝長輩，神宗「宮中每見必拜，雖皇太后亦敘姑嫂之儀，」尊貴無比。恩澤所及，暄獲賜第，景臻更是富貴榮華。成婚時，破例封左軍衛大將軍；遷官時，「節度使至團練使皆賜牌印旌節，自開封府妓樂百戲迎引，……是日諸處街司以至市井游手，前後傳呼，謂之搶節，至少三、五千人，犒賞大有所費，猶藩鎭遺風也。」正如神宗所說，景臻「是箇享福節度使。」他的兄弟都補官，恐怕也因爲他的關係。大長公主生子，神宗賜名忱，後來又吩咐景臻：「主賢，宜有子，爲擇婚配。」娶唐介孫女，亦即晁迥外孫。「忱從二家遊，伯父勰在翰苑，因得識一時名卿。」哲宗立，「愛之，常使侍左右。」徽宗將景臻自節度使晉級爲開府儀同三司（使相）、少師，又拜忱爲節度使，御書「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忱又有兩位幼妹嫁宗室。靖康之禍，長公主「以先朝女，金人不知，留于汴京。」其後隨諸子（景臻共十一子）南遷，遇賊，一子被殺。後居於台州，卒年八十六。[88]

錢曖和暄兩支的際遇清楚顯示，世家大族的地位不能單憑入仕來維持。曖和景諶父子兩代沒有高官，家道就開始中落，甚至喪失了父蔭的特權。景諶反對新政，不但犧牲了個人的政治前途，也斷了本支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暄一支若非景臻娶仁宗女，也可能因爲沒有高官而中落。憑其他兒子的官品（在母親去世時，最高只至正六品），下一代已不能受父蔭。不過，世家大族的成員和親家衆多，只要其中一部分攀到高位，便能夠憑蔭補加惠遠親，或者互相援引，可以減慢家道中落的速度，這也相對地增加了家族復興的機會，這是一般士大夫家庭所無法企及的。而錢家能夠更勝文臣世家一籌，又在於他們一直維持文武二途並重的發展。與錢暄一門有關的就有五位右班殿直（岳父、一子、二孫、和一位孫女

86　何冠環〈宋初三朝武將的量化分析〉，121。

87　同85。

88　同85。

婿）。錢家與武臣之家通婚，再生產武臣後代，其目標則爲入內廷供職（如閤門和內殿承制即屬武臣系統中的清要職位）。我們相信，由於士大夫愈來愈重進士、輕武臣，這些內廷職位後來便由皇親國戚、開國以來的武臣世家、以及少數新興武臣家庭所「壟斷」。[89] 諸錢供職內廷，接近帝室，不僅受信任，而且以首都爲根據地，流動性有限，較易維繫家族。他們能夠數代與皇族聯婚，部分當然是由於他們是「勳賢之後。」而他們藉此聯婚而富貴榮華，反過來又增加了家族的名聲和地位。

第三節　錢俶兄弟各支

錢俶排九，一共十四名兄弟，他們或後人歸宋後，散居京師，婚宦的情況一定十分複雜，但資料卻極少。族譜提供的族人，大都事蹟無考，徒有人名和官稱（大部分都是武官），其中也有世系顚倒和張冠李戴的情況，故下文只就較可驗證的人物加以論述。

錢儀和儼（原名信）是俶僅存的異母弟，入宋時是觀察使，差兩等便是節度使。儀卒於九八五年以前，事蹟不詳，似乎一直留在京師，沒有任何實職。他在吳越時「好晝寢，多以夜決府事及游宴。」[90] 這樣的作風恐怕難以討好注重吏治的太宗。

錢儼嗜學，博涉經史，又謹愼能辦事，在俶助攻南唐時，他就負責漕運。歸宋後，儼與朝廷文士交遊酬唱，「文章精麗富贍，落筆千言立就，世推爲大手筆。」著作甚多（亦多不傳），太宗曾稱讚他是「儒者」。大約在九八六年，儼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後卒，就地詔葬。[91] 他的下一代落籍和州，據稱一共有

89　參考 K. A. Wittfogel, *New Light on Chinese Society* (New York: 11-12), 引自 E.A. 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104, 略爲更用。

90　《長編》，卷 18：5b：「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甲午」。

91　《宋史》，卷 4：「太宗」：53；卷 156：「藝文」：5118；卷 157：「藝文」：5166；卷 480：「錢儼」：13914-13915。《長編》，卷 18：5b：「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甲午」。《續慶系譜》，卷 10：30b。《錢氏家乘》，〈支派〉：34a。

九個兒子，事蹟多不詳。第三子是昭聰，官至右班殿直，葬在臨安，生有三個兒子，次子隱之官至大理寺丞出知嚴州，在新安定居，可見家族十分分散。[92] 錢儼另一個兒子是昭慈，贈左衛將軍，兒子順之曾任左侍禁閤門祗侯，[93] 但家道中落，靠兒子錢藻中進士和制科而得重振。

錢藻「幼孤，家貧，母〔改〕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藻後「葬其母於蘇州，〔定居，〕……故今又爲蘇州人。」一〇五三年，藻舉進士，一〇五九年，以宣州旌德尉又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著有《賢良策》五卷）。宋人稱制科爲高科和大科，不試詩賦，只試策論，遠較進士諸科爲難。北宋進士凡二萬二千餘人，中制科的僅三十九人，其中有十人位至宰執，五人至翰林學士。[94] 藻進入中央後，出任一連串的清要之職（包括國子監直講、集賢院校理、秘閣校理、英宗實錄院檢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樞密直學士、和翰林侍讀學士等）。這些職位讓他有機會認識了一班館閣之士，其中的曾鞏還替他寫墓誌銘。[95]

參知政事馮京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罷政。錢藻的制詞稱馮京「執正不回，一節不撓。又云大臣進退，繫時安危。」被御史彈劾所言不實，罷直舍人院。他與蘇軾爲詩友，後來受軾的詩禍牽連，罰銅二十斤。他曾經爲人所不敢爲，三上書請攝政的曹太后還政給三十一歲的英宗。[96] 新舊黨爭時，他明哲保身，堅持中立。他知開封府時，「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靜，」並不以政事見稱。他爲官有年，多屬美缺，但宦囊不豐。卒時，神宗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他的一個兒子

92　《錢氏家乘》，〈支派〉：34a；《續慶系譜》，卷11：9a，卷16：18a。

93　〈宋人世系考〉，10：8a。

94　王德毅〈宋代賢良方正科考〉，157。

95　《宋史》，卷208：「藝文」：5364；卷317：「錢藻」：10348；《續慶系譜》，卷11：13a；《東都事略》，卷48：「錢藻」：8b；曾鞏《元豐類稿》，卷13：「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總頁106上，卷42：「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總頁266下-267下；《長編》，卷270：5a-b：「熙寧八年十一月己卯」，卷298：17b：「元豐二年六月己未」，卷301：12b-14a：「二年十一月庚申」；《宋會要輯稿》，「禮」：14：44a-45a，「選舉」：8：35b，11：10，19：16a。

96　同95，又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65：「錢藻」：10a-11a；《東軒筆錄》，卷5：「馮京與呂惠卿」：2b-3a。

皞中元祐三年（一〇八八）進士。[97]

錢昱、郁、昭序、昭度和昭晟都是錢俶的姪兒。昱歸宋時三十六歲，與兄郁並授刺史。郁之事蹟不詳，昱則頗有行政經驗，例如在錢俶助攻南唐時，他是東南水陸行營應援使。他琴棋書畫皆通，多與朝士大夫酬唱。在換得文官後，四任知州，但率無善政。前後五娶，晚年「貪猥縱肆，生子百數。」所以太宗斥責他「貴家子無檢操，不宜任丞郎，」又不讓他回中央。眞宗即位，他請求回京，隨即病死。子絳，眞宗時出知全、辰等州，勇於進取，以屢破蠻夷有功，由內殿崇班閤門祗侯升爲內殿承制，是走武官入內廷當差的路。絳兄涉（又作緲）在九八五年中進士，事蹟無聞。[98] 另一子紘，仕至右殿直，其他兒子據說散居河南，事蹟不詳。[99]

昭序喜聚書，九九五年知通利軍，以勤幹聞名，又獻祥瑞討好太宗。他官至如京副使，只是中級武官。[100]

昭度工詩，多警句，入宋後，在「酒樓人散雨千絲」之中，「長憶錢塘江上望，」感歎「西北高樓在，東南王氣銷。」他敘遷至西頭供奉官，只是很低的武官。[101]

昭晟在眞宗初年是閤門祗侯，後參與河工，曾因量減修河工料而晉升崇儀副使，旋因黃河決隄而貶秩，後來的事蹟不詳，終於內園使；子穆，至內殿崇班。[102]

---

97 同95。

98 《宋史》，卷480：「錢俶」：13903-13904；卷480：「錢昱」：13915-13916；卷493：「西南溪峒諸蠻」：14177；卷496：「西南諸夷」：14225；《長編》，卷55：7a：「眞宗咸平六年七月己酉」，卷91：2a：「天禧廿年正月乙卯」，卷91：4b：「天禧二年二月丁丑」，卷92：2a：「天禧二年五月甲戌」。

99 《錢氏家乘》，〈支派〉：8b，15a。

100 《宋史》，卷480：「錢昭序」：13916；《長編》，卷37：7a：「至道元年四月乙巳」。

101 《宋史》，卷208：「藝文」：5362；卷480：「錢昭度」：13916；《宋詩紀事》，卷5：15b-6a。

102 《長編》，卷52：10a-b：「咸平五年七月丙申」；卷61：16a：「景德二年十一月戊辰」；卷63：10a：「景德三年六月甲午」。《續慶系譜》，卷13：3b。《元豐類稿》，卷45：「壽安縣君錢氏墓誌」：總頁284-285。

資料如此有限，只能簡單推論如下：

第一：由其世家背景而來的行政經驗和文學薰陶，是錢儼和昱出仕的主要資本。

第二：錢儼和昱都久任外官，儼更是落籍和州。上文已指出，外任與終老外官的子弟愈多，家族離散的情況就愈嚴重。分散的各支往往獨立發展，離開了家族大屋簷的蔭庇。藻的母親因家貧而改嫁，很明顯是因爲得不到其他族人的照顧。另一位錢秉德，亦「貧不能家。」[103]

第三：開封的環境大致上與吳越錢塘相近，有利於這些貴族子弟的發展。如儼和昱在京師與士大夫往來酬唱，享有文名。他們離開家族根據地而外任，須要獨立應付一個不同的環境，結果毫無表現。

第四：除昱和藻等少數人外，其他人大都保留武官身分。昱的情形與惟演類似：本人由武轉文，至下一代則文武雙途並重，一子是進士，另二子以武官入內廷供職。

第五：錢儀的官品雖高，但下一代如果沒有高官，後人就會逐漸喪失父蔭的資格。與昭度情況相同的子弟，爲數必多。他們靠一分武散官的薪俸過活，沒有恩蔭的特權，子孫容易淪爲平民。關係更疏遠的親屬，情況更差。在吳越時，他們至少還可以得到王室的一些照顧，[104] 現在不但喪失了貴族的身分，而且喪失了多年經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從頭開始。在此狀況下，科舉便是他們入仕的最主要途徑。

第六：中進士後，以儘量留在京城發展爲上策。例如錢藻走清要官的路，地位也最高。但他身後蕭條，又可見單憑薪俸，難以維持世家大族的場面。可惜有關錢氏家族投資置業的詳情仍不清楚。

第七：世家背景、恩蔭補官、和科舉進士，都只是入仕的敲門磚；如何上進，又要視才能和機緣而定。例如錢絳就優於昭序和昭度，甚至在錢涉之上。又

103　岳珂《桯史》，卷6：「汪革謠讖」：64。

104　在吳越時，錢俶兄弟諸房子孫無官者，「謂之孫侄班，以屬尊而年長者，謂之班首。設宗籍以主之，賜別第以居之，日一參謁。宴勞賞賚，極其豐腆。郡守府屬有缺，則隨才而補之。丁之始生，必有籍，籍即廩給之。」《吳越錢氏宗譜》：「序：浙江慶系譜序」：3a-b。

如錢涉與錢藻同是進士，而藻的出身遠遜於涉，結果卻歷仕清華，而涉則寂沒無聞。

第四節　錢倧一支

錢昆和錢易是遜王錢倧的兒子。錢倧被大將胡進思推翻，異母弟錢俶才得以繼立。俶歸宋時，錢倧已死，有子十一人，「群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依賴科名作爲進身的階梯。[105] 九九二年，兄弟一齊應舉，主考官是蘇易簡，結果取中錢昆，而「才學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的錢易反而落第。[106] 這跟太宗要改革「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的文風有關。[107]

太宗時殿試，「以先納卷子無難犯爲魁。」[108] 歷屆狀元如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灝、和陳堯叟等都因爲先交卷而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尙敏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爲改革這弊病，太宗將試卷交由考官定等第，又故意出難題，務使舉子深思鑽研，洗脫澆薄之風。但十七歲的錢易未到正午便完成試卷，「言者指其輕俊，特黜之。」[109]

此後六年內（九九二～九九七），宋朝沒有舉行科舉。其間，蘇易簡曾向太

105　《宋史》，卷317：「錢易」：10343。《東都事略》作「獨昆與其弟易願從科舉。」（卷48：「錢昆」：8b）當時易才三歲，恐怕不會出於自願。昆之生卒年不確，約生於九四九至九七六年間，九九二年成進士，仁宗時卒，享年七十六歲。其餘兄弟見《續慶系譜》，卷10：5a-b；卷11：7b-8a；卷13：4a-b，似有不少錯誤，待考。

106　《宋史》，卷317：「錢易」：10344；洪邁甚至稱他是「名儒碩學」，《容齋隨筆：四筆》，卷4：「鬼宿渡河」：47-48。又見《能改齋漫錄》，卷6「祭以鬼宿渡河爲候」：164；卷8：「獨鵲棲庭柯」：212。錢昆亦有才華，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5：49。

107　朱希召《宋歷科狀元錄》，卷1：23b-24a，引《歸田錄》，卷1：「太宗時親試進士」：2a，但稍有不同。

108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4：「宋咸茂談錄云」：12a。

109　《長編》，卷33：2a：「淳化三年三月戊戌」：《宋史》，卷426：「陳靖」：12692。

宗推薦錢易有李白之才，「太宗驚喜曰：誠如是，吾當白衣召置禁林。」但不久李順、王小波亂起（九九三～九九四），其事便一直擱置，太宗亦去世。九九八年，錢易參加開封府試，僅得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於是上書攻擊考官馮拯的試題意涉譏諷，又得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的支持。宋白在《宋史》「文苑傳」中排名第一，尤好獎掖文學後進，隱然是文壇宗主。他在太宗時三掌貢舉，但頗有徇私之嫌，又曾奉詔撰錢惟濬碑，得饋贈塗金器。馮拯則是個重實際的行政人才，討厭寅緣入仕和不切實用的人，「建請凡蔭補京官，試讀一經，書家狀通習爲中格，始得仕。」他尤其厭惡「江浙人士專業詩賦以取第，」他力言錢易無行，不可冠天府多士。眞宗亦想壓抑浮俗，於是在「文、行兼著」的標準下把錢易降一等。錢易這次爲了未中魁首而惡意攻擊考官，誠屬無行。眞宗沒有嚴格追究，可能是與本人尙文愛才有關。他在東宮時，「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110]

錢易不肯甘心，因爲狀元在當時政界中「不五、六年即爲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111] 他在次年（九九九）再考，又是第二，此後歷任內外官，屢次上言，例如建議百僚皆赴常參和廢除酷刑等，得到眞宗留意。一〇〇六年，朝廷接納錢易親家盛度的建議，復設賢良方正等制科。錢易應舉，入第四等（前三等例

110　《長編》，卷43：12a-b：「咸平元年十月癸丑」，卷68：5a：「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宋史》，卷285：「馮拯」：9608-9611，卷317：「錢易」：10343-10345；卷439：「宋白」：12998-13000；《續慶系譜》，卷11：9a。宋初進士考試著重詩賦，南人遂盡得其利，藉科舉大量入仕。在一〇〇八年，馮拯就說：「比來自試，但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江浙人士專業詩賦以取科第。望令於詩賦人內兼考策論。上〔眞宗〕然之。」但情形未見改善。一〇三九年，富弼對仁宗說：「近年數牓以來，放及第者，如河北、河東、陝西三路之人，所得絕少者何？蓋此處人物，稟性質魯，不能爲文辭、中程試，故皆老於科場，至死不能得一官。……今縱有稍在顯官者，亦不過三、五人而已。」（《長編》，卷68：5a：「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癸未」；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164：5b：「仁宗寶元二年」）參考劉伯驥《宋代政教史》：965-970。

111　《東軒筆錄》，卷六：「本朝狀元及第」：6b。又《歸田錄》，卷1：13a：「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又見《石林燕語》，卷6：「國初天下始定」：86。

不除人），除秘書丞。[112] 至是，錢易乃證明自己確能超乎一般進士之上。他通判蘄州，上疏乞除非法之刑，得眞宗嘉納。後眞宗祀汾陰，錢易與宋綬等從行，「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頗爲注意實務。[113] 一〇一二年錢易出宰開封，在繁劇的工作之餘，「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于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114] 似已一洗以前輕脫之風。一〇一六年，判三司都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紿者除之。」[115] 這是一個寬簡惠民的建議。一〇二〇年，行知制誥，與翰林學士同屬天子近臣，合掌內外制詞，褒貶貴戚大臣之進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116] 何況眞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拔。」更加榮耀無比。同年，兄錢昆吏治有績，被呂夷簡推薦於朝。次年，錢易眞除知制誥，賜金紫。一〇二五年，爲翰林學士，草從弟惟演遷官同平章事麻。「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此係違反宋代「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的避嫌法，可算是從兄弟的一項殊榮。錢易在同年去世，享年四十九歲。仁宗召見易妻，賜以冠帔，也是一項殊榮。至於錢昆，在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之後，連知七州，寬簡爲政，以秘書監致仕，國史不立傳。昆、易兄弟出身相同，而易的成就在昆之上，其中因素自然很多。例如錢易勇於發言，容易得到皇帝注意，又獻〈殊祥錄〉，討好

---

112 《宋會要輯稿》，「選舉」：10：11-12；《宋史》，卷292：「盛度」：9759-9760；《長編》，卷60：16a-b：「景德元年七月甲子」。據《東都事略》，卷55：「盛度」：2a：眞宗「密詔〔度〕撰策題馳驛以聞。」據上引《宋會要輯稿》，策題出晁迥之手。參見《長編》，卷107：8a-9a：「天聖七年二月壬子」。

113 《宋史》，卷291：「宋綬」：9733。又見同書卷432：「劉顏」：12831。

114 錢易《南部新書》，卷首：「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四庫全書總目》，卷140：「小說家類一：南部新書十卷」：33a-b。據錢序，錢易時爲度支員外郎，但《長編》，卷77：15a：「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壬辰」，作「祠部員外郎」。今從錢序，以錢明逸爲易子故。錢易的著作頗多，見《宋史》，卷206-208：「藝文」：5230，5262；《錢氏家乘》，〈支派〉：13b。

115 《宋史》，卷317：「錢易」：10343-10345；《長編》，卷90：「天禧元年八月己丑」：9b。

116 《長編》，卷27：「雍熙三年冬十月丙申」：20a-b。

封禪的眞宗，得轉直集賢院。他在科場中連得兩次第二，又中制科，更是一個重要因素。他廁身清要之途後，就差不多沒有再離開首都，終至成爲翰林學士。能夠長期留在京師，就是一個難得的政治機緣。[117]

親家盛度的曾祖是吳越的縣官，父親入宋後官至尙書度支郎中。跟錢易一樣，盛度進士出身，以文學有聲於時，歷任知制誥和翰林學士。他的女婿胥偃，亦有文名，後登進士甲科，亦是知制誥和翰林學士。偃知貢舉時，竟敢拆視彌封，擇有名士置上等。他看中歐陽修的文章，把他留在門下，等到歐陽中了甲科，就招入東床。歐陽後來也是知制誥和翰林學士。這幾家人結爲親家，大抵都是以對方的才學爲主要條件，家世不一定重要。例如錢家和盛家原是君臣關係，胥偃富而歐陽貧。他們的目標，大概就是利用過人的文才爲政治資本，入館過閣，希望登壇拜相，因爲館閣號稱儲才之地，是到政事堂的終南捷徑。[118]

當錢易去世時，兒子彥遠只有十三歲、明逸十一歲，受蔭，得以「刻意家學。」一〇三八年，彥遠中進士；一〇四六年，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在一〇四二年，明逸亦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自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就只

117　有關錢昆，見《長編》，卷96：「天禧四年七月庚戌」：1a；《東都事略》，卷48：「錢昆」：8b。錢易部分見《宋史》，卷317：「錢易」：10344；《長編》，卷97：「天禧五年二月壬子」：2b；《宋朝事實類苑》，卷24：「衣冠盛事：錢希白」：301；《揮麈錄・前錄》，卷2：「弟草兄麻」：17；《石林燕語》，卷4：「國朝兩制」：49。又本傳中如修車駕所過圖經、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等事，據《長編》及《宋會要輯稿》等書，皆非個人之責任，而且與本文主題無一定關係，故不一一敘述。

118　參考《宋朝事實類苑》，卷24：「玉堂之盛」：300，引《金坡遺事》。有關盛度各事，見《宋史》，卷292：「盛度」：9759-9761；《長編》，卷88：3b-4a：「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丁未」；卷93：5b：「天禧三年六月戊戌」；卷114：20a：「景祐元年閏六月辛酉」。有關胥偃和歐陽修各事，見《宋史》，卷294：「胥偃」：9817-9818；《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132-133，139註18。北宋各朝學士和知制誥人數，可用李燾《皇宋十朝綱要》的統計；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例如仁宗朝五十二名學士中，至少錢易、盛度、胥偃、錢明逸和歐陽修就互爲親戚；又例如在一〇一九年，胥偃試學士院，就因爲盛度和錢惟演都是翰林學士而要避嫌到舍人院考試，見《長編》，卷94：1a-b：「天禧三年七月辛酉」。易妻是盛度族人，見蘇頌《蘇魏公文集》，卷52：「錢起居神道碑」：13b-14a。蘇軾《東坡志林》則謂：「盛度，錢氏婿。」（卷二：「記盛度誥詞」：3b）待考。

有錢氏一家。時人歌詠，就有「賢良方正舉，父子兄弟同」之句，「士大夫載述，以爲衣冠卓異。」至是，錢易父子不但替本支帶來光榮，而且替錢氏樹立了一個新的典範。在一〇五九年，錢藻又以進士中賢良方正科，可謂仁宗一朝的佳話。彥遠子錢勰，自少即受制科的訓練，「十三歲，制舉之業成。」一〇七〇年應賢良方正科，但是落選。[119] 一〇七三年，神宗罷制科，到一〇八七年才恢復，一〇九四年又罷，到南宋才恢復。[120] 自此以迄宋亡，再無錢氏子弟中過制科，但昔年盛舉，已足令錢倧一支爲後人津津樂道。[121] 不過，明代柯維騏說：「易父子兄弟皆登制科，又宋所僅有也。其間履行無疵，惟一彥遠。」[122] 我們就先討論文學可觀而政事可議的錢明逸。

錢明逸中制科後，通判廬州，兩年後（一〇四四），「爲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這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位置。仁宗朝台諫官的權限很大，對政策決定、人事任免、政令執行，都可過問。當時，宋代的立國政策積久成病，而內憂外患接踵，如何改革，引起爭論。不少士大夫不時越職言事，不但批評政策，而且有意標榜儒學的道德標準，連大臣的政治作風和手段也加以批評，結果引起政爭。在政爭中，台諫官的發言權便容易變質成爲政治鬥爭的工具。[123]

一〇四三年至一〇四四年，宰相呂夷簡被歐陽修力攻下台，范仲淹和富弼等登上二府，展開「慶曆改革」，也引起政爭。錢明逸阿附宰相章得象、樞密使賈

---

119 《宋史》，卷317：「錢彥遠」、「明逸」、「藻」、「勰」：10345-10350，卷291：「宋敏求」：9736；《蘇魏公文集》，卷52：「錢起居神道碑」：12b-22b；《宋會要輯稿》：「選舉」，10：24a-25b，27b-29a；11：12a-14a，7a-8b，31：14b-15a。

120 〈宋代賢良方正科考〉；聶崇岐〈宋代制舉考略〉。

121 《揮麈錄・前錄》，卷2：「錢武肅」：19；《後錄》，卷5：「國朝父子兄弟叔姪聯名顯著」：144。

122 柯維騏《宋史新編》，卷101，「論曰」：117上；又見《宋史》，卷317：「論曰」：10352。

123 詳見《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本文有關慶曆時期的改革和政爭，多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王德毅〈呂夷簡與范仲淹〉、《太平治蹟統類》，卷10：「慶曆朋黨」、《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37，卷38各項、及《宋史紀事本末》，卷29：「慶曆黨議」，等等爲據，除引文外，不一一注明出處。

昌朝、和參知政事陳執中，首劾（一〇四五）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又攻擊范仲淹「欺詐」，使二人罷政。明逸再接再勵，清除慶曆改革諸臣，首先彈劾歐陽修與甥女張氏有姦情，累歐陽修下獄，但以證據不足，止於外放。次年，明逸又彈劾余靖年少時曾犯法受笞，不宜爲侍從，使余靖被免去右正言知制誥之職。明逸本人則飛黃騰達，旋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才五年。」他也是多才多藝，仁宗改鑄黃道渾儀、漏刻、和圭表，均下詔由明逸「詳其法，」寫下了《刻漏規矩》一卷和《西國七曜曆》一卷，又派他出使契丹。一〇四九至五〇年，明逸繼父親錢易後塵，知開封府，每日都可以朝見皇帝，但終因處理妄人冷青僞稱皇子案不善，罷翰林學士，外放。同時，章得象、賈昌朝、和陳執中的相業，也在一〇四五～一〇四九年內先後結束。[124]

明逸外任知州和安撫使時，頗有成績。例如他曾成功地解決宋朝和邊疆屬國的糾紛，保存國體，也曾爲一位罰過於罪的知州平反。但他昔年傾陷改革諸臣，也樹立不少政敵。十六年後（一〇六六），參政趙槩向英宗推薦錢明逸，但御史呂大防彈劾明逸毫無建言，又無治績。這恐怕也是意氣之言：明逸爲諫官時，曾劾去酷吏，又請准仁宗多接見求對的言官。這個好的建議，還被南宋名臣趙汝愚選入《諸臣奏議》中。明逸復爲翰林學士不到一年，神宗繼位，再罷，原因是御史蔣之奇彈劾他「姦邪」、「傾險憸薄」、阿附權要、陷害范仲淹，而且「文辭

124　《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212-213，248-250；《宋史》，卷11：「仁宗」：226，卷76：「律曆」：1743-1744；卷206：「藝文」：5274-5275；卷252：「郭承祐」：8852；卷333：「李載」：10708；卷317：「錢明逸」：10346-10348；《長編》，卷154：5a-6a：「慶曆五年正月乙酉」，11b-12a：「五年二月乙巳」，卷157：3a-b：「八月甲戌」，卷159：2a：「六年七月乙未」，4b：「七月己未」，卷161：4b：「七年八月丁卯」，卷163：18a：「八年三月庚申」，卷165：2a-3b：「八月丁丑」，13b：「十一月己未」，17a：「十二月庚寅」，卷166：15a-b：「皇祐元年三月庚申」，卷168：7a-b：「二年四月戊辰」，卷207：3a-b：「治平三年正月辛巳」，卷209：8a-b：「四年三月丙寅」，卷222：7b：「熙寧四年四月辛未」。《默記》，卷下：41-42。有關宰執的任免，可參考《宋史》，「宰輔表」和《宋宰輔編年錄》有關各年各人。明逸奏議，見趙汝愚《諸臣奏議》，卷77：「上仁宗論乞上殿三班外亦聽諫臣求對」。

紕繆，政術乖疏，貪贓有聞，沈湎汚濫。」明逸乃引疾求去。事實上，蔣之奇離「姦邪」也不甚遠。他受歐陽修提拔爲御史，看到歐陽因爲支持英宗追崇本生父爲皇考而備受非議，便倒戈彈劾歐陽與長媳有曖昧行爲。他彈劾明逸的多項罪名，多屬無可驗證。一〇七一年，明逸卒。[125]

在一〇四三～四五年的政潮中，范仲淹、富弼諸人的政治作風並非無懈可擊，章得象、賈昌朝等人亦非一無可取。錢明逸以利害所在而攀附章、賈，不足深責。問題是他利用言官的地位從事政爭，失去應有的客觀立場，可謂失職。他醜詆富、范，中傷歐陽，和揭發余靖隱痛，更屬不擇手段，故被批評爲「傾險」。[126] 他這樣的政治行爲，以及後來言官的非議和侮辱他，皆屬濫用職權；他們既然不能自律，朝廷惟有立法管制。在仁宗一朝，一方面是廣開言路，似乎實現了儒家由士大夫言事的理想，另方面卻是對士大夫法禁日嚴。例如在一〇四三年，詔執政大臣非假休不許私第受謁。一〇四四年，詔輔臣所薦官不得爲諫官、御史，又詔戒朋黨相訐及按察文人肆言行怪者。一〇四七年，詔諫官非公事不得私謁，臣僚入朝，留京不得超過十日。一〇四九年，詔台諫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風聞彈奏，又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毋通賓客。一〇五三年，詔諫官、御史毋挾私以中善良。直到一〇五九年，才取消一〇四三和一〇四四年的詔令，復准臣僚詣執政私第及可用執政所薦者爲御史，但對言官仍不放鬆。一〇六〇年，詔言官無得彈劾小過和不關政體之事。一〇六一年更痛斥言官：「台諫爲耳目之官，乃聽險陂之人興造飛語，中傷善良，非忠孝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者絀之。」這些措施皆爲仁宗朝所獨有，代表「士人政治」不理想的一面。[127]

錢彥遠則站在理想的一面，除了不少的地方善政外，他中直言極諫科後，便

---

125 同124。

126 《宋史》，卷317：「論曰」：10352。

127 《宋史》，卷11，12：「仁宗」：216，218，219，223，226，227，234，244，247。太宗時，王禹偁曾建議中書樞密不得於本廳揖延賓客，以防請託，但被謝泌駁回，太宗并以泌表章送史館。見《長編》，卷32：5a-6a，「淳化二年四月己丑」。

眞以「直言極諫」爲己任。尤其是他成爲諫官（一〇四八）後，在三年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密啓顯奏，凡八十餘章。」著有《諫垣集》三十卷和《諫垣遺稿》五卷（均佚），被收在《諸臣奏議》裡的就有十件。與明逸同是言官，但他沒有利用發言權作爲政治工具，而是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的主張與慶曆改革的項目和內容有不少雷同的地方。例如他提出黜陟宜均信、名器宜愼重、取士要進廉良，牧守要取覈實，勸農之官須設，禁衛之兵須精，和法令須重信。這些與〈十事疏〉的「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厚農桑」、「修武備」、和「重命令」相若。對不法的權倖，尤其是內侍和貴戚，彥遠連章彈劾，「權倖由此知警。」仁宗不但接納他多次對權倖得到非分恩寵的彈劾，而且親書「博學」二字賜之。「玉立朝紳、霜清諫紙」，實在是彥遠最好的寫照。他又與宋敏求、蘇頌、和胡宿交好，他們有三個共同點：學問淵博、仕歷接近、以及被認爲是正色立朝。[128] 彥遠與他們往還，切磋學問，而子弟耳濡目染，對保持錢倧一支的文學傳統，自然大有幫助。彥遠三十七歲便去世，遺下勰、燮、穌、臨四子，都以蔭補入仕：錢臨以縣主簿卒；穌曾被指爲蔡京「姻黨」，官至直秘閣知荆南府；燮「智略沉敏，老於吏事，」終於知州；勰的成就最高，但家運卻最差。[129]

一〇七〇年，錢勰舉制科，中秘閣選，殿試初考和覆考都入第四等，但詳定官韓維認爲其文「平緩，」竟被黜落。[130] 他任職流內銓主簿時，把複雜的遷升

128　《宋史》，卷208：「藝文」：5362；卷291：「宋敏求」，卷317：「錢彥遠」，卷318：「胡宿」，卷340：「蘇頌」；《蘇魏公文集》，卷52：「錢起居神道碑」：12b-22b；《錢氏家乘》，〈支派〉：13b；《續慶系譜》，卷11：13a-b；袁韶《錢塘先賢傳贊》：15a-b；《雞肋編》，卷下：2a；《長編》，卷167：15a-b：「皇祐元年十一月戊午」；彥遠各章奏見《諸臣奏議》，卷34，49，51，68，71，84，98，105，122。

129　《蘇魏公文集》，卷52：「錢起居神道碑」：21a。《咸淳臨安志》，卷65。「錢穌」：10a。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70：「錢隨州〔燮〕墓誌銘」：1a-4b。《宋史》，卷343：「溫益」：10923。

130　《宋史》，卷317本傳作「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李綱《梁谿集》，卷167墓誌銘作「制策極論新法，忤執政意，與孔文仲俱被黜。」二說俱待考。今從《宋會要輯稿》，「選舉」，11：12a-14a；《長編》，卷215：14a-15b：「熙寧三年九月壬子」。

程序編成進班簿，得神宗稱賞，召見上殿，許以清要之職。其後，神宗在錢勰母喪期間堅持要他出使高麗，因爲「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勰歸朝，神宗盛讚他文字應對得體，擢中書舍人，賜三品服。[131] 他詩才敏捷，知開封府時，能一面審案件，一面次韻答詩，故蘇軾稱他「電掃庭訟，響答詩簡，近所未見也。」時人稱勰、軾爲「元、白」。神宗更器重他的政事才能，派他兩任鹽鐵判官，和提點三路刑獄。及對西夏用兵，神宗派他爲陝西都轉運使，錢勰「轉餉如期，…無擾於民，嘗躬督飛輓，夜行界中百餘里，冒險無所畏避。」故深得神宗賞識，親自預選他爲右司郎中，等他母喪之後出任。在熙寧變法期間，他保持中立；王安石曾找他爲御史，他以「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爲辭，又敢於論奏王安石賞識的宦官程昉治河不實。一〇八六年，進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前是攝任數月）。他以不畏強禦爲己任，「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一〇九三年，他以戶部尚書加龍閣直學士復宰開封，有謂「視事不數日，滯訟一空，群盜奔佚。」他三尹開封，「號爲本朝第一，」是他政事過人的最好明證。同年，哲宗親政，章惇復相，開始清算政敵，勰即爲其中之一。八年前（一〇八六），章惇被元祐諸臣力攻外貶，謫詞就是錢勰的大作。其中「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兩句，遠近傳播，連哲宗也記得一清二楚，因此招致章惇的怨恨。不過，哲宗實在欣賞錢勰，不但不准他的「懼而求去，」而且在明年（一〇九四）親自選拔他爲翰林學士，而不用章惇三次進薦的林希。錢勰在召見時，「多詔留身，」哲宗甚至要用他爲執政。舊恨加上新仇，章惇遂謀報復。一〇九五年，尚書右丞鄭雍因被台諫力攻而求去，哲宗命錢勰「善爲留詔」，制書中有「群邪共攻」之句，第二詔又說「弗容群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章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台攻之，」主要就「群邪」、「群枉」和「厚誣」等用語攻擊錢勰「代言不實，意在朋比，…煽惑朝廷。」勰遂落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出知池州，「一斥不起，」於一〇九七

131 當時傳聞神宗想聯結高麗討伐契丹，但神宗告訴錢勰并無此意。不過，勰在高麗時曾打算招納女眞人。見《長編》，卷350：12b：「元豐八年二月丁亥」。勰亦曾出使契丹，見《宋史》，卷281：「畢仲衍」：9523。

年病卒。同年被列入「元祐黨籍」，奪官，永不復敘，下葬時，以「方在謫籍中，不克銘于墓。」家族自大受打擊。到一一〇〇年徽宗繼位，希望平息新舊黨爭，遂追復勰龍圖閣學士，錄三子官。一一〇二年，又立黨籍。一一〇八年，勰落黨籍。子伯言，一一一九年賜進士出身，直秘閣，次年直龍圖閣，一一二二年以「託疾避事」落職出知，一一二五年以「誕慢」和「蔡絛之黨」的罪名提舉亳州明道宮。未幾，宋室南渡，用人之際，以伯言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節制兩浙、淮東將兵及福建槍杖手以討賊，不料伯言以賊勢洶洶，棄城遁走，乃被竄削。弟伯牛奉母南遷，「徙居江浙，貧窮失所，日不聊生。」另一子德輿，亦賜進士出身，事蹟不詳。[132]

錢彥遠、勰和燮的妻子都是大家閨秀，分別是故相丁謂、呂蒙正、和陳堯佐的孫女。錢易、彥遠和勰的十一位女婿，「皆士人，」但都不算很有名，確知爲進士的有兩人。錢勰的地位最高，四位女婿的職官也較高，曾經分別是朝奉大夫（正五）諸王府侍講、朝奉大夫通判大名府、朝請大夫（從五）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和端明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正四）提舉嵩山崇福宮。除上述三子外，勰尚有

132　《宋史》，卷22：「徽宗」：415；卷24：「高宗」：447-448；卷25：「高宗」：453-454；卷166：「開封府」：3942-3943；卷294：「王欽臣」：9817；卷317：「錢勰」：10349-10350；卷342：「鄭雍」：10899-10900；卷399：「鄭獬」：12122；卷468：「程昉」：13653；《梁谿集》，卷167：「宋故追復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錢公〔勰〕墓誌銘」：4a-16b；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13：「錢穆父尹京，爲近時第一」：666引《明道雜志》；「元豐末」；665-666引《揮麈錄・前錄》，卷2：「錢氏富貴三百年」：19；《第三錄》，卷2：「錢遜叔伯言」：240-241；《後錄餘話》，卷1：「元豐末」：293-294；張端義《貴耳集》，卷中：「章子厚」：40；卷下：「錢穆父尹開封」：70；《能改齋漫錄》，卷14：「傀儡起於王家」：399；《錢氏家乘》，〈支派〉：13b；《續慶系譜》，卷11：19a-b；《宋宰輔編年錄》，卷9：27b；《長編》，卷303：3b：「元祐元年十二月戊戌」，卷408：2b：「元祐三年正月己未」，卷413：10b：「三年八月庚子」，卷414：5a-6a：「三年九月庚戌」，12a-13a：「三年九月」；《長編・拾補》，卷12：13b-16b：「紹聖二年十一月甲子、己巳」；《宋會要輯稿》，「職官」，67：12b，16b；69：11a，17b；76：26b-27a；「選舉」，9：16a；32：21a-b；34：51a；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卷29：「錢伯言」：4a-b。王昶《金石萃編》，卷144：「元祐黨籍碑」：1a-33a。

九子，前四子（杲卿、東美、朝隱、魯望）相繼登科，成一時佳話；太學三舍法行，第六和第八兩子皆入上舍。他們的事蹟雖然不詳，但從錢易開始，四代均有文名，交遊之士，如宋白、盛度、宋敏求、蘇頌、胡宿和蘇軾等又係博學名人、館閣佳士，已足夠令錢氏被譽爲「衣冠世族，儒學之盛，甲於本朝，」并不因爲錢勰四兄弟不是進士而稍有遜色。事實上，錢氏亦以衣冠世族標榜，如明逸就纂有《衣冠盛事》一卷和《熙寧姓纂》六卷。錢易、彥遠、和勰祖父孫三人都名列《宋元學案》和《學案補遺》，而錢傒一支則有景諶和長卿被列入學案。憑文學不斷地肯定自己，是錢倧一支的特色。就父子兄弟相繼登制科而言，他們的確是宋朝第一。他們的文學，甚至掩蓋了他們的政事。勰對家族十分照顧，「弟姪婚宦皆經其手，收養孤遺，家常至二百口，儉約均一。」這樣看來，錢家似無義莊義田之類的設施，只係由個別成員隨時收養孤遺。其弟錢穌更隨仕宦所至而終於遷回錢塘，並建閣藏書，由蘇軾題名爲「錢氏書藏」，墳在靈隱天竺山間。勰等仍葬於開封，後遷葬於鎮江金壇縣。[133]

結　論

宋初禮遇諸國降臣，傳爲美談。[134] 但就授官的優待來說，吳越錢傒的近親可能還不如他的臣下。太祖和太宗在短短十八年內統一南方，沒有足夠的人手接管各地行政，只好利用各國舊有官吏。只有虛位沒有實職的錢傒近親，則要等到太宗雍熙年間（九八四～九八七），才稍得出仕。[135] 當時宋朝根基已固，太宗有餘力發動二十餘萬兵馬四路伐遼，已無須顧慮五代十國的殘餘力量。錢家當時

133　同上註《梁谿集》，又《宋史》，卷204-6：「藝文」：5151，5227；《太倉稊米集》，卷70：「錢隨州〔燮〕墓誌銘」：1a-4b；《咸淳臨安志》，卷65：「錢穌」：10a。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1：14，卷96：9；《補遺》，卷9：59，卷10：50；分別是錢藻、勰、易、和彥遠。本文主要利用王德毅等《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和衣川強《〈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人名字號別名索引》。

134　參見趙翼《廿二史箚記》，卷24：「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135　錢傒的一位女婿也是如此，見《宋史》，卷277：「慎從吉」：9445-9446。

食指浩繁，入宋後因餽贈各方，致家資幾盡，亦必須急謀出路。他們的憑藉，包括世家地位、科舉入仕、恩蔭補官、和婚姻締結。以下就這幾方面總結錢俶、錢倧、和他們兄弟各支的發展。

（甲）世家地位

作爲吳越王國的後人而吳越又在入宋時和平納土，這是錢家子弟的特殊背景。但這背景要到眞宗繼位後才成爲有利的條件。太宗雖然在九八四年以後稍爲任用錢氏近親，但並不理會錢家的衰落，反而有毒死錢俶和故意長久外放錢昱和錢儼以拆散錢家的嫌疑。當時錢家已淪落到了夾道求食的地步，猶幸愛護舊族和喜好文學的眞宗及時出現，始得絕處逢生。眞宗以錢氏助攻南唐、和平納土，不同諸「僞」（當日詔書仍用此稱謂），[136] 故特加優遇；對錢家的文學，更是欣賞，諸如擢用惟演、惟濟，厚待惟治，實難盡數。錢家的名譽和地位，乃得逐漸恢復。惟演不但自詡自期爲宋朝第一家族，更利用眞宗的寵愛和政治地位多方向地發展家族事業。其中一途，就是在個人轉文資後，想法維持家族的武臣地位，藉此安排後代供職內廷，這是一般文臣家族所不易辦到的。他身受「親嫌」之害，但在罷政後仍然促成兒子與皇室聯婚，應該是基於「王國後人」和「本朝第一」的心理。同樣，帝室也會考慮到這些條件。神宗的姑丈錢景諶和曹詩，就是開國以來擁有爵封的「舊族」，這是沒有爵封的世家以及新興的名族所不能企望的。綜合來說，錢家長遠的歷史、崇高的爵封、和文武兼備的資格，使他們在事業發展和與皇室通婚上勝於大多數家族。

不過，世家的興旺，也賴有傑出的領導人物。錢俶久病，惟濬早死，惟治又被太宗外放，在返家料理父喪後即久病，致家事不肅，鬧出姦殺案。在眞宗特赦之後，本人仍要連降十官，家族也在此時深陷困境。錢惟演發奮圖強，除了定下文武雙軌發展和與帝戚聯婚的策略外，更修族譜以繫宗族、編諸王遺著以興家學、重庭訓以鞭策子弟，又請朝廷修杭州家廟，尊錢俶爲尙父等，重振家族。但

136　《宋會要輯稿》，「崇儒」：7：75a。

其最後圖謀相位，一念之差，名譽掃地，諸子也被悉數外放。自此以後，錢家未再見有領袖人物，不過根基已固，策略既成，後人因之，遂可自保。

（乙）科舉和蔭補

錢俶一支只有少數進士，如錢丕和景謙，兩人的政治地位卻很低。錢倧一支則進士輩出，錢易父子兄弟更連中制科，替家族帶來無上光榮，更建立了一個新傳統。如錢藻中制科後便說：「十年二第，屢玷於主司；一門四人，無替於祖烈。」[137] 錢儼一支能夠重振家聲，也因爲錢藻舉進士、中制科。所以，科舉確是社會中下層向上竄升和搏取名譽的主要途徑。至於錢家四中制科，在宋朝更屬絕無僅有，其他家族罕能相比。

蔭補的特權讓錢俶數代補官領俸，不用靠科舉來維持門戶，也使錢倧的第四代生活無憂，得以刻意家學。單就錢倧一支的維持來說，科舉和蔭補有相輔相成的作用。如果視各支爲一整體，也是錢俶一支憑蔭補，錢倧和儼一支憑科舉，相輔相成，維持宗族。[138]

不過，科舉和蔭補只能增加家族成員出仕的數量，要在成千上萬的進士和蔭子中出人頭地，非靠才幹不可。力挽狂瀾的錢惟演，品秩已高，但仍「以才能

---

137 《澠水燕談錄》，卷6：68。

138 例如可以保持錢家憑科舉出人才的形象。當時不少科舉出身的新貴往往輕視蔭補得官者。例如與弟弟孫僅連續兩屆（992和998）都分別蟬聯省元和狀元，後來又先後中制科的孫何，就批評蔭補者「或目不知書，或心惟黷貨；」請求眞宗「凡京朝官籍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次年（1001），眞宗亦詔令「群臣子弟奏補京官者試一經。」（《長編》，卷47：10a：「咸平三年五月乙亥」；《宋史》，卷6：「眞宗」：114）若干世家大族亦以舉業成績爲標榜，時人亦每每以此期望。例如范宗翰斥責仁宗時翰林學士彭乘不訓子弟文學，就說：「王氏之琪、珪、玘、瓘，器盡璠璵；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又據稱，「今之天下衣冠子弟，取高科者，唯王、韓二族爲盛，故世之人多舉之以訓子弟焉。」（《宋朝事實類苑》，卷10：「名臣事跡：貴門子弟」：109）又例如「蒲城章氏，盡有諸元。子平爲廷試魁，而表民（望之）制科第一，子厚（惇）開封府元，正夫（粲）鎖廳元；正夫子（綬）爲國學元，子厚子（援）爲省元，次子（持）爲別試元。其後自閩徙居吳中，族屬既殷，簪裳益茂，至今放牓，父有居上列者。章氏自有登科題名石，刻在建陽。」（《揮麈錄・前錄》，卷2：「浦城章氏」：22）

進」，而且在成爲翰林學士後仍要盡觀天下書。錢易勇於進取，四番應試，屢建嘉謨。兒子彥遠和從子藻也是在中舉後再試制科。錢勰蔭補入官，制科被黜，但終憑才能備受朝廷重用。他三尹開封，可見長於政事，他以蔭子而榮登北門，可見文學過人。錢暄場屋失意，但以政事見知於神宗，終於貼職待制。反之，錢丕、涉、和昆寂沒以聞；錢儼雖位高品崇，但其孫媳竟因家貧改嫁；錢昱率無善政，老於外任，這些都是科舉和蔭補不足爲恃的例子。錢藻身後蕭條，也說明單憑官俸，不足維持大族的事實。

歷朝政潮迭起，捲沒不少名族，錢家也浮沉其中。眞宗時，錢惟演、丁謂與劉后及時制止寇準的立儲密謀，得保權位，惟演更晉位樞府，從此「門闌廝役、青紫群列，號爲貴顯。」仁宗時，錢明逸攻擊慶曆改革諸臣，傾陷富弼、范仲淹，中傷歐陽修，揭發余靖陰私，落得「傾險」惡名，使家族蒙羞，也令「士人政治」受到懷疑。神宗熙寧變法，錢景謀卻反對新政，得罪王安石，不但終身爲外官，且使家道中落。其後新舊黨爭，錢藻因草馮京免相制詞過譽而罷去西掖，錢勰拒絕王安石、得罪章惇、又與「舊黨」人士過從，結果名陷謫籍，禍延後代。從哲宗後期開始，錢氏幾乎絕跡政壇。在此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之狀況中，錢家之所以維繫不墜，主要在于婚姻關係。

（丙）婚姻關係

錢家較一般家族幸運，能夠數次與皇室聯婚。自從錢惟演因爲劉美人幸運地晉位皇后而變成后戚後，錢俶一支就享受到種種好處。第一是身份提高，例如由失國之臣回復貴族的地位。第二是享受特權和蔭庇，例如蔭額的增多，使澤及遠親；殘忍揮霍的錢惟濟因得太后庇護而得善終，又如錢晦能夠由文轉武，錢曖和僊芝破例授館閣職等等。第三是維持爵祿，例如惟演在罷政後因劉太后的恩寵而依然富貴榮華，其妹晉封國夫人；到錢暄家道不寬時，又因景臻娶神宗皇姑而再度繁榮。第四是留居京師，可以照顧家族。第五，也是最主要的，是再與帝室聯姻，例如在劉太后時，錢曖娶郭皇后妹、錢晦娶太宗外孫，孫女又嫁宗室，後來惟濬孫錢恕娶眞宗姪女，錢景臻兩女又嫁宗室。到了南宋，景臻的曾孫女一嫁與

孝宗的長子，一嫁與光宗爲妃。以上五項互爲循環，令錢家數代受益，自然勝於一般名族。但惟演因「親嫌」而罷政，仁宗又下詔禁止后戚爲宰執，則錢惟演後人也算是以犧牲個人的政治前途來換取家族在社會和經濟上的長遠利益。至於錢惟演因丁謂的失敗而變成「孽臣之累姻」，受言官之攻擊，以致無法入相，說明了這種政治婚姻的危險，常在不能控制對方的行動下，或會因對方的失足而受連累。

錢倧一支以士族爲婚姻對象，其中至少有四位媳婦是相門之後，但女婿卻不乏普通的士人。這種不限門第的婚姻關係，或有助於泯滅大家族與一般士大夫的界限，促進社會上下層的交流。至於是否如陶晉生先生所說大家族有選擇地吸收部分的新興士大夫家庭而形成「新階級」，則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外，錢倧一支與武臣家庭通婚的例子仍屬未見，這大抵是較有地位和沒有武官背景的士大夫家庭輕視武人的反映吧。這也是錢儼和錢倧二支明顯不同的地方。

最後我們也注意到錢家重要成員都是以出任中央要職爲主。他們不但可以享受到中央官的種種好處，還可以照顧以開封爲根據地的家族，這就遠勝於起於地方而向中央發展的家族，也勝過源於開封而宦遊四方的家族。以首都爲根據地本來即勝人一籌，但問題在於如何增加留在中央任職的機會。錢家的策略有二：第一是成爲清要官。錢惟演本人是翰林學士，又特意安排兒子曖和姪兒儇芝進入館閣。錢易父子兄弟和錢藻，則憑中制科來證明自己的才學在一般進士之上，藉此進入清要之途。除了彥遠早卒和錢藻僅至翰林侍讀學士外，錢易和明逸都成爲翰林學士。彥遠的兒子錢勰制科失意，但終成父志，登上銀台。互爲親家的錢易、盛度、胥偃、和歐陽修，以及錢易、彥遠、藻和勰的友好如宋白、宋敏求、蘇頌、胡宿、曾鞏、和蘇軾，都是有同樣經歷的著名文士。他們身爲皇帝顧問，故有時外放以增加對地方政事的了解，或更以出任開封府尹來增強行政能力，也是到兩府的捷徑。

第二個策略是當內廷差使。由於這幾乎是皇親國戚和高級武臣子弟的「特權」，故只有錢儼一支才能夠出任。第一，他們原來就有節度使和團練使等的頭銜，不少後人就憑蔭補成爲武官。第二，錢惟演憑帝姻的關係把錢晦由文轉武，

錢昱也是自己轉文資後，由二子保持文武雙線的發展。惟演與劉美通婚，錢暄的岳父、兩子、和孫女婿都是武臣，可見在武臣家庭之間也有著一定的維繫力量。

從上述可知，科舉固然帶動社會中下層的向上流動，但要持續廁身上層，不能單靠科舉和蔭補。錢俶一支還依靠與貴族聯婚，憑武官的資格供職內廷，和爭取留在中央來維持家族的繁榮。就這三個條件說，錢俶一支最後可視爲貴族，例如錢忱就入《宋史》「外戚傳」。錢倧一支除了依靠爭取出任中央官外，大抵就是與名族通婚，以及與館閣和侍從中人往來援引。這些人往往就是科舉和制科的考官，例如宋白三掌貢舉，都有徇私之嫌，胥偃更拆視彌封，挑取名士；胡宿是錢彥遠制科的一個考官，宋敏求也是錢勰制科覆考入等的一個考官。又例如景諶對主考王安石執弟子禮，後來又被安石拉攏。此外，在同一事件中又有跨越兩支關係的人物。例如錢明逸依附章得象和賈昌朝攻擊慶曆諸臣，又痛詆力迫呂夷簡下台的歐陽修，而章得象曾出力將錢惟演的惡謚「文墨」改爲「文思」，賈昌朝則是錢明逸制科的一個考官，而呂夷簡曾推薦錢昆、提拔明逸，其孫希績又娶錢暄之女。總之，這些既串通數代而又橫貫兩個家族系統的關係，實在極爲錯綜複雜。對這個複雜關係的深入瞭解，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後記：拙文承王德毅、梁庚堯、黃寬重、及《集刊》審查人諸先生提示意見，糾正漏誤，謹此誌謝。初稿蒙劉子健師修正，定稿卻只能獻於靈前，令人神傷。（八十三年二月廿一日）

（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徵引書目

1．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

2．千葉叟，〈宋代の后妃—太祖、太宗、眞宗、仁宗四朝〉，《青山博士古稀紀念宋史論叢》（論叢刊行會；東京：三省堂，1974）：209-238。

3．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

4．文瑩，《湘山野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

5．不著人，《吳越備史補遺》（筆記小說大觀）。

6．王夫之，《宋論》（台北：中華書局，1970）。

7．王明清，《玉照新志》（宋元人說部叢書）。

8．王明清，《揮麈錄》（上海：中華書局，1961）。

9．王昶，《金石萃編》（北京：藝文印書館，1966）。

10．王梓材、馮雲濠，《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書局，1962）。

11．王銍，《默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

12．王稱，《東都事略》（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13．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北：大化書局，1984再版）。

14．王德毅，〈呂夷簡與范仲淹〉，《史學彙刊》，4（1971）：85-119。

15．王德毅，〈宋代賢良方正考〉，氏著《宋史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111-180，附一表。

16．王應麟，《玉海》（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再版）。

17．王闢之，《渑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18．司馬光，《涑水紀聞》（台北：世界書局：1963）。

19．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0．衣川強，《〈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人名字號別字索引》（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4）。

21．朱希召，《宋歷科狀元錄》（宋史資料萃編第四輯）。

22．朱國楨，《湧幢小品》（筆記小說大觀）。
23．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河南，中州書畫社，1983）。
24．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25．宋綬、宋敏求，《宋大詔令集》（台北：鼎文書局，1972）。
26．何喬新，《椒邱文集》（明人文集叢刊第一期）。
27．何冠環，〈宋初三朝武將的量化分析〉，《食貨》，16：3・4（1986）：115-127。
28．李攸，《宋朝事實》（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29．李燾，《皇宋十朝綱要》（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30．李綱，《梁谿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31．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世界書局，1983四版）。
32．吳曾，《能改齋漫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3．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34．岳珂，《桯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35．阮廷焯，〈錢惟演金坡遺事輯〉，《大陸雜誌》，54・5（1977）：35-36。
36．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37．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38．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39．洪邁，《容齋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0．范祖禹，《范太史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41．柯維騏，《宋史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4）。
42．袁韶，《錢塘先賢傳贊》（光緒四年刊本）。
43．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
44．徐松，《宋會要輯稿》（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6）。
45．晁補之，《雞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46．梁天錫，《宋樞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47．張端義，《貴耳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
48．陳邦瞻、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台北：三民書局，1973）。
49．陸心源，《宋詩紀事補遺》（光緒十九年刊本）。
50．陶晉生，〈北宋幾個家族間的婚姻關係〉，《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933-943。
51．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52．莊季裕，《雞肋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53．曾鞏，《元豐類稿》（四部叢刊初編）。
54．曾鞏，《隆平集》（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
55．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台北：中華書局，1970二版）。
56．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台北：學生書局，1964）。
57．彭百川，《太平事蹟統類》（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
58．勞格，〈宋人世系考〉，氏著《讀書雜識》（月河精舍叢鈔）
59．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
60．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
61．趙汝愚，《諸臣奏議》（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
62．趙雅書，〈五代吳越國的創建者—錢鏐〉，《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7（1980）：163-215。
63．趙翼，《廿二史箚記》（台北：世界書局，1974）。
64．厲鶚、馬日琯，《宋詩紀事》（台北：中華書局，1971）。
65．潘永因，《宋稗類鈔》（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66．劉一清，《錢塘遺事》（文淵閣四庫全書）。
67．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68．劉伯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華書局，1971）。
69．鄭再時，《西崑酬唱集箋注》（山東：齊魯書社，1986）。

70．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71．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
72．歐陽修，《歸田錄》（宋元人說部叢書）。
73．蔡襄，《蔡忠惠公集》（清雍正十二年刊本）。
74．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宋元地方志叢書）。
75．蔣超伯，《南漘楛語》（通齋全集）。
76．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台北：廣文書局，1968）。
77．錢木父，《吳越錢氏續慶系譜》（康熙十八年本，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藏微卷1088093）。
78．錢文選，《錢氏家乘》（1924，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藏微卷770692B）。
79．錢世昭，《錢氏私誌》（文淵閣四庫全書）。
80．錢志遙等，《吳越錢氏宗譜》（乾隆十二年本，台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藏微卷1129619）。
81．錢受徵，《吳越備史雜考》（筆記小說大觀）。
82．錢易，《南部新書》（叢書集成初編）。
83．錢惟演，《玉堂逢辰錄》（《說郛》卷290）。
84．錢惟演，《金坡遺事》（《說郛》卷77）。
85．錢惟演，《家王故事》（《說郛》卷29）。
86．錢謙益，《絳雲樓書目》（粵雅堂叢書初編）。
87．錢儼，《吳越備史》（筆記小說大觀）。
88．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89．魏泰，《東軒筆錄》（文淵閣四庫全書）。
90．聶崇岐，〈宋代制舉考略〉，《史學年報》，2・5（1938）：17-37。
91．蘇頌，《蘇魏公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92．蘇軾，《仇池筆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
93．蘇軾，《東坡志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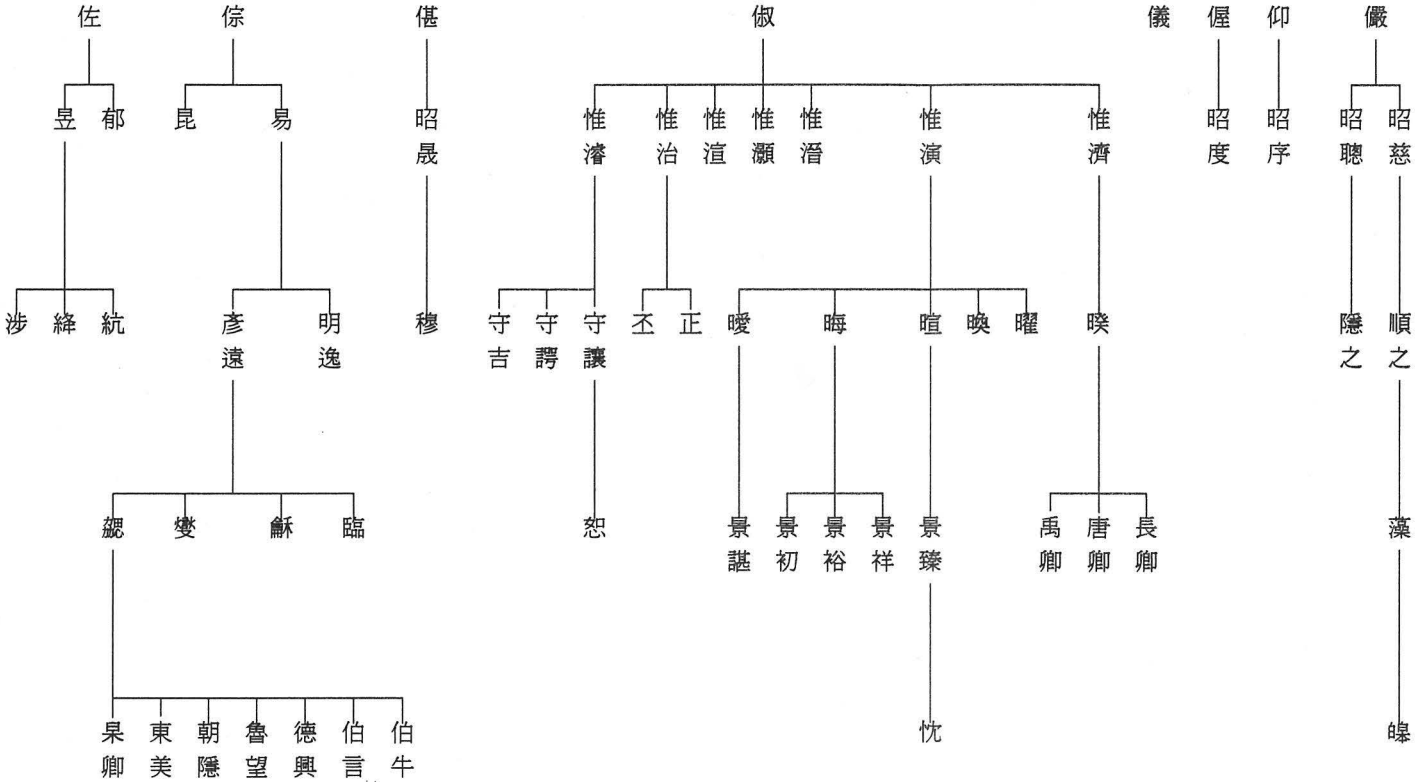
94．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部叢刊初編）。

95．蘇轍，《欒城集》（四部叢刊初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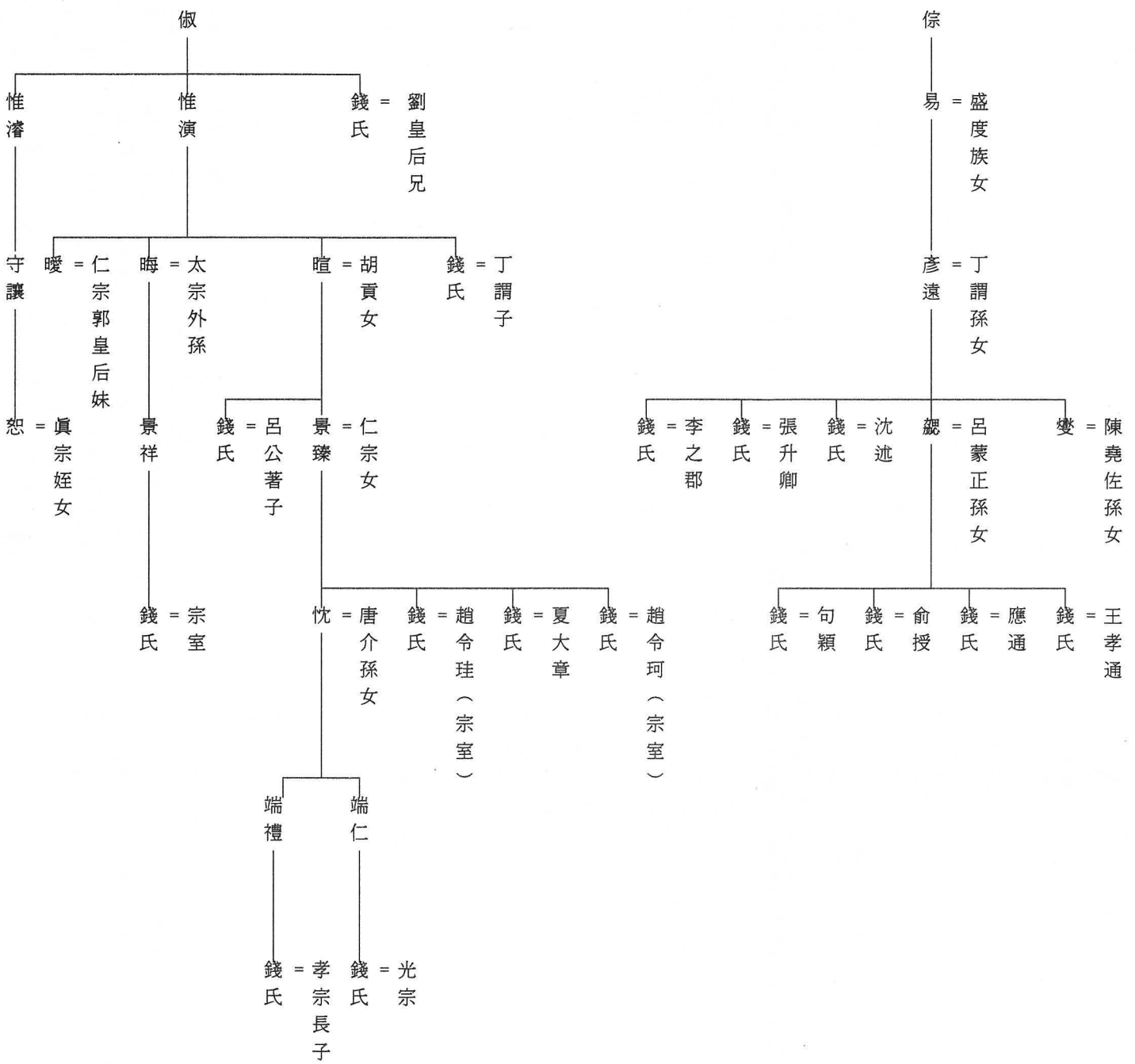
96．Kracke, E.A. Jr., "Family v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0 (1947): 103-123。

附表一　家系（以正文中出現人物爲主）

武肅王錢鏐
文穆王元瓘（子）
忠獻王佐（子）



附表二　婚姻


佾
惟濬
惟演
錢氏 = 劉皇后兄
守讓
曖 = 仁宗郭皇后妹
晦 = 太宗外孫
暄 = 胡貢女
錢氏 = 丁謂子
恕 = 眞宗姪女
景祥
錢氏 = 宗室
錢氏 = 呂公著子
景臻 = 仁宗女
忱 = 唐介孫女
錢氏 = 趙令珪（宗室）
錢氏 = 夏大章
錢氏 = 趙令珂（宗室）
端禮
端仁
錢氏 = 孝宗長子
錢氏 = 光宗
倧
易 = 盛度族女
彥遠 = 丁謂孫女
錢氏 = 李之郡
錢氏 = 張升卿
錢氏 = 沈述
勰 = 呂蒙正孫女
燮 = 陳堯佐孫女
錢氏 = 句穎
錢氏 = 俞授
錢氏 = 應通
錢氏 = 王孝通